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9月30日第39期

本期目录

史实考订

张光渝 最后的晚会——1971年五一节晚会史料辨析

陈益南 1976年10月，吴德不可能去西山看邓小平

书海泛舟

韩少功 多面人与多面上帝（《革命后记》选读）

孙 涛 走出运动治国的误区（《虔诚与疯狂》选读）

王醒民 《毕竟东流去》序

李自茂 有关武斗的一些思考（《毕竟东流去》选读）

庞国义 文革战争亲历者的可贵反思——读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生逢乱世

王以时 看陈子庄作画

忆旧思亲

张一哲 艰难岁月中的温馨记忆——回忆我的中学老师毛礼钊

萧建民 怀念在牛田洋遇难的晏家富同学

编读往来

李正权对上期蒋国辉文提出一个问题

顾嘉滨对上期徐友渔文提出一个订正

【史实考订】

最后的晚会

——1971年五一节晚会史料辨析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94辑。这里发表的是未删改的原稿，发表前作者又略有修订。

自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两次庆祝晚会：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和十一国庆节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各界英模和代表人物以及外宾一起观赏节日焰火。广场上，则有数十万各单位和学校的群众围成一个个圈子，唱歌跳舞联欢。这个传统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戛然而止。

自1971年国庆节前突然取消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直到1984年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时，才举行了十三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和焰火晚会。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型庆祝活动再也没有恢复，1971年五一节晚会，就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五一节晚会。

这一年的五一晚会，值得回顾。这不单因为它是最后一次五一晚会，还因为它是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的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围绕林彪和这次晚会，又生出一些违反史实的说法。

一、杜修贤的“林彪迟到”说和“仅此一张”照片说

杜修贤和顾保孜合著《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红镜头》）中，杜修贤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详细回忆了林彪在这次五一节晚会上“迟到”和提前离去的意外事件，被各种报刊和出版物引为史料证据，也使得这一次五一晚会更加引人关注。

杜修贤在书中提到，他亲眼目睹了林彪在那次焰火晚会上迟到，又提前离去的经过。他还详细叙述了他无意中抢拍了“唯一”一张林彪在晚会上的照片，因而避免了一场宣传上的麻烦。

杜修贤在《红镜头》中说：1971年五一焰火晚会，“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

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共和国红镜头》上册 第197—198页）

这段关键的叙述有三个要点：

第一、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在天安门观礼台同桌落座后，林彪仍然没到，桌前空着一把椅子。

第二、周恩来发现林彪迟到，十分焦急，派秘书去打听情况。

第三、林彪“慢条斯理”地到达后，从杜修贤身边经过，杜闻到了林彪身上的一股“怪味”，并称那是林彪注射吗啡的结果。杜修贤说，林彪是在总理的再三电话催促下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接着，杜修贤又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他无意中拍摄了当晚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的过程。因为林彪的提前离去，杜修贤又讲到了周恩来闻讯发火批评记者的过程：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周恩来马上让杜修贤把其他摄像记者找来，问他们是否拍下了毛和林在一起的镜头。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活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第203—204页）

杜修贤的这段话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因为林彪的“迟到”和突然离去，杜修贤只拍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一张照片。

第二、周恩来紧急追问其他电影电视记者，他们竟然没有来得及拍哪怕一个镜头，交了“白卷”。

第三、杜修贤通过周恩来之口，说林彪身体不好，因为“上午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的活动，晚上不想来，是周恩来动员来的。

五一晚会的照片第二天要见报，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怎么办呢？杜修贤讲到了周恩来的“紧急善后”——午夜时分，杜修贤奉召前往中南海：

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

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第204页)

在这段话中，杜修贤再次证实：他拍摄的那张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是当晚晚会上唯一的一张两人合照。第二天（5月2日）的报纸上，也只刊登了“仅此一张”的毛林合影。

而且，连五一晚会的电视新闻中，也只得借用了杜修贤的那张固定画面的摄

影照片，用以填补毛林在一起的镜头空缺，掩饰林彪的“迟到”和“不辞而别”。本人亲历，白纸黑字，生动详实，这应当是真实事件吧。

二、真相：林彪没有迟到，照片不止一张

个人亲历和回忆，固然是珍贵的历史参考资料。但如果有条件能与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相比较，就可能发现其中的不实不确之处，有的，两者还可能完全相反。很遗憾，杜修贤讲述的1971年五一晚会之事，就与真相完全相反。

1971年距今四十余年，当事者还相当多。从历史角度说，时间也不算长。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那个晚会不但留下了新闻报道，而且留下了纪录片视频资料。这是最权威的原始记录。

先看报纸。笔者专门查找了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这一

天的报纸头版套红竖排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报道内容的开头是：“新华社一日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晚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一起，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然而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不仅刊登了据杜修贤说的他偶然拍到的“仅此一张”的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照片，而且还有第二张照片：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众军人手持语录本的热列欢迎（见左图）。毛、林、周三人的着装均与五一当天焰火晚会时的着装一致；毛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穿军装、呢大衣。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全国各大报转载时多了“传真照片”四字。）

很显然，这是杜修贤五一节当晚拍摄的第二张有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镜头的照片。据杜修贤在《红镜头》中说，“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规定”。（第 197 页）五一当晚第一线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镜头的记者）只有杜修贤一人，他至少拍了两张有林彪的照片，怎么说成是“仅此一张”？

更为幸运的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查到 1971 年五一晚会的纪录片视频。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1 年 5 月联合摄制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给了我们更为明确的真相答案。

这部图像已经褪色的纪录片，在播放到 11 分 01 秒的时候，镜头出现的画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鱼贯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电梯厅，在场军人和群众手挥语录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笑着挥动语录，向周围人群致意。接着，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外的门口，先后与从大厅走出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外宾握手。林和毛挨得很近，林彪情绪正常，面带微笑。

然后，镜头显示毛和林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一起走下台阶，在检阅台护栏前的圆桌边落座。第 14 分 35 秒，是林彪在桌边微笑的特写镜头；第 19 分 24 秒，又有一个林彪的特写镜头。

以上报刊和视频资料证明：

首先，杜修贤所说林彪迟到一事根本不存在，因为他是和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因此，《红镜头》所言周恩来看到桌边空位、焦急寻找林彪，又派秘书去查看，打电话催促等情节，也就完全无法成立；

当然，杜修贤详细描述的有关林彪“慢条斯理”，身带“怪味”，“精神萎靡”等等形容词，可以说是无中生有；

最后，《红镜头》文中，因为摄像记者没有拍到林彪的镜头而遭到周恩来批评责备，周恩来事后与杜修贤讨论如何使用所谓“仅此一张”的照片的说法，就更不可信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叙事失误。亲历者把时间、地点记错，把事情发生的顺序记错，把一些重要情节遗漏等情况，是难免发生的。但像《红镜头》这样将林彪 1971 年五一节晚会上的行为完全凭空想象，以亲历者身份生造许多戏剧化的细节，导致与真相完全相反的结果，还是很少见的。这是为什么呢？

三、干扰亲历者回忆真实性的两大因素

回顾往事，特别是政治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其一是记忆力的干扰，记混、记漏、记错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其二是先入为主的有倾向性的主观思维障碍。在 1971 年五一晚会的回忆中，杜修贤可能同时受到了上述两个干扰的影响。

在杜修贤的叙事中，他详细讲了 1971 年五一节“上午”到天安门城楼拍摄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领导干部和检阅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队伍的事情。他说，林彪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出现在城楼上，“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第 193 页）

其实，五一节白天的群众游行活动，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取消了，杜修贤说的这件事根本不存在。1971 年的报纸和五一节纪录片也完全没有涉及毛泽东、林彪上午的活动，更谈不上群众游行。而杜修贤却很可能将他晚上拍摄的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来到天安门城楼接见干部和各界群众代表的事情，错记成上午，也由此使得林彪“迟到”和“唯一一张”说有了可能。

五一纪录片显示，毛泽东在晚会结束退场时，身后只有周恩来而没有林彪，林确实是提前离去的。这个离去如何发生，是不是“不辞而别”，杜修贤并不知道。他的“惊异”感只是在发现林彪已经离去后才产生的。但既然林“迟到”了，又早退了，拍到“唯一一张”照片的可能性也就出现了。可能性就这样在回忆中变成了“事实”。

另外，由于林彪的“反面角色”身份，杜修贤在回忆时不经意间或者刻意加入了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如“滑稽”，如“不上照”，如“一脸枯黄”、“萎靡不振”、“浓浓的怪味”等等。从视频资料看，这些主观描述都不存在，我们也无法确认杜修贤在当时就有这样的印象。而一旦叙事者有了这些主观倾向，回忆就容易出现不符合事实的因素。

1971 年五一晚会的事情告诉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阅读和研究，要秉持客观、全面的立场，尽可能收集更多方位的信息，加以对比，去伪存真，切忌先入为主，切忌以主观印象和个人好恶判定和剪裁。

【史实考订】

1976 年 10 月，吴德不可能去西山看邓小平

陈益南

党史学者韩钢教授在其《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等文章中，

为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是否阻止邓小平复出一事，进行了辩驳论证。之中，韩钢教授引用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的一段文字，并作为首要证据，论说当时华国锋并未阻止邓小平的复出。

韩钢教授在这些文章中说：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韩钢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还说：“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然而，史料却证明，吴德这段回忆的内容，并不靠谱！相反，其记述出现了时空错乱。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1976年10月，邓小平根本就还没住到北京西山，而是仍被软禁在宽街的老住处。

自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后，他的住地几经变换，到入住西山军委高层住处的25号楼时，已是第二年（1977年）2月3日的事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详细的叙述了邓小平在此期间住处变动的情况：

1976年4月7日下午三时，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命令中央警卫局的人，将邓小平带离他的宽街住处，转到东交民巷17号，予以软禁，不许邓外出。

既是保护（防止有人来冲击），也是监管。

随后，当天也将卓林转到了东交民巷住处，宽街住处只留下了邓小平的几个子女。

不久，中央办公厅来人又通知邓小平的子女，要他们从宽街住处搬出，转到育群胡同的一个小院去住。宽街住处就空下来了。

邓小平夫妇被软禁在东交民巷17号后不久，卓林因突发眼病，经批准，住进了301医院。孤身一人度日的邓小平，于6月10日，通过汪东兴给毛泽东转呈了一封信，请求回原来的住处，与家人一块居住。6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

邓小平的这个要求。于是，邓的子女便又得以搬回宽街。但因为7月6日朱德元帅去世，故直到7月19日，邓小平夫妇才搬回到宽街住处。

搬回宽街，软禁的性质并没变，邓小平仍不能外出，只能呆在院子里活动。好在家人都住在一起，邓小平才得以避免孤寂，也能通过可以外出的子女，获得一些外面的信息。

“四人帮”被抓捕后，住在宽街的邓小平，在10月10日给华国锋与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

但是，此举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邓小平的政治处境，也无什么改善。

相反，华国锋为首的中央，仍在重申“继续批邓”。

如果说，党报媒体当时仍在宣传“继续批邓”，尚可以认为是高层意在稳定局势。

但若是中央高层领导人，在一些内部讲话中，真的还在继续批邓，那么，意在“稳定局势”的说法，就难以令人相信了。

例如，当年11月18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重权在握的汪东兴，就毫不隐讳而明确的继续贬评邓小平：“总理逝世后，发现邓小平不行了。邓这个人有错误，错误严重，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对邓小平要根据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么还是正确的。主席指示，批邓是对的，邓是错误的（小道消息传说邓小平从四川回来啦，恢复了副总理职务，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邓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得远，试了一下，不行嘛！邓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个正确对待，这一点老同志要注意。”（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宋永毅等所编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976年12月4日，邓小平突发重病，在宽街的家里治疗无效，12月9日，不得不住进301医院进行治疗。

住医院期间，12月14日，中央作出了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资格。

住医院的后期，有些老同志开始到医院里来看望邓小平了，如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

邓小平在医院里住了55天，直到第二年（1977年）2月3日，康复出院后，经叶剑英安排，就入住西山军委高层住处25号楼去了。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吴德等人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去看他，只能是1977年2月3日以后的事了，而绝不可能在1976年10月。

由此推及，吴德在其口述回忆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所说于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之事，其内容发生的时间，肯定是搞错了。

吴德所说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不会是在1976年的10月，而应是1977年2

月后的事。

因为，吴德明确说了，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去的西山，看邓小平。

吴德说：“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既是在 1977 年 2 月间才搬到西山居住，那么吴德等人看望邓小平，也就只能是在 1977 年 2 月 3 日以后。而吴德说去西山看邓小平，是在他所说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无疑，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举行时间，就不会离吴德等人 1977 年 2 月后去西山的时间，间隔多久。

因此，可以推断，吴德所说的华国锋宣布请邓小平复出之三条内容的政治局会议，其举行时间，绝不会是在离吴德去西山之前四个月的 1976 年 10 月。

而 1977 年 2 月间同意邓小平复出，与 1976 年 10 月就同意邓的复出，性质上还是很有些不同的。

2014 / 08 / 15

【书海泛舟】

多面人与多面上帝

（《革命后记》选读）

韩少功

文献是史学家们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他们醉心于原始资料的白纸黑字，其论文常常挂载长长的索引注解，如同一个主持人操纵诸多他人的节目。

深挖文献确保了言之有据的好学风，提升了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不过“文革”中的很多白纸黑字却不可当真，需要知人论世的小心甄别。我在乡下遭受批判，黄队长的发言听上去相当恶毒，“臭知识分子”“王八蛋”“老鼠屎”一类都是极左腔。这样的批判文字若落到有些研究者手里，黄队长活脱脱就是一个魔头。但实际情况是，他越这样胡说八道我越高兴，拍桌子瞪眼睛更让我放心，因为他大帽子下开小差，排除了我偷盖公章那一更危险的把柄。他越是同我切割，越可能继续当队长，继续充当我的保护伞，后来的通风报信和准假放行也才有了可能。

白纸黑字哪能还原这一切？由此可知，文献诚然重要，但文献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构成其庞大底部的具体情境却隐匿莫见，通常是更深远也是更重要的真实。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之下，多数国人深通伪装术，擅长丢卒保车、指桑

骂槐、声东击西、阳奉阴违、先予后取、棉里藏针一类中国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里藏半句，需要后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难言之隐，哪些是言不由衷。从黄队长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诸多言说，恐怕都只能如是观。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当时很多青年接触异端思潮的保护伞，于是英国唱片，俄国画册，法国或美国的小说……曾一度成为他们争相打开的文化窗口。为了确保行事的合法性，让告密者说不上什么，他们往往会在作品封皮上批一个“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这些文字当真？

刘少奇、邓小平倒台后，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也好，连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都拍着胸口声称自己深受害于“十七年黑线”，一心靠正义而伟大的“文革”来伸冤平反。我所在学校的一批教师就组成过这样的“黑鬼战团”，到处贴标语和散传单，一再愤怒地上访请愿——你能把他们的趋时言语当真？

.....

要求一些外国人看清这个谜局，当然是苛求。其实不少中国人对此也一头雾水。“文革”最火爆之际，1966 到 1968 年间，几乎全体国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举毛主席画像，都怀揣毛主席的红皮语录本，都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似是清一色毛派，铁板一块的红色御林军。但毛泽东说话很多，方方面面都说过，于是最容易成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符号，兼容各方利益诉求，兼容普天下的隐秘心机。民众没有反对他的自由，但有解释他的自由，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为我所用的可能，丝毫不妨碍大家各行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多义化，使看似统一的奉旨造反，实际上成了五花八门的假诏执法。这个“毛派”与那个“毛派”唇枪舌剑，这一伙“毛派”与那一伙“毛派”拳脚相加，这一时期的“毛派”与那一时期的“毛派”南辕北辙……多义化沦为一地鸡毛。哪怕两口子在灶台前顶住了，纠缠于炒萝卜该切丝还是该切片，一旦情绪上来，一旦急红眼，他们也可能扯上“态度”“立场”“路线”，确有些无厘头，太像十八扯。意识形态用语怎么听也缺乏逻辑性以及可识别性。

谁要把这一切当真，谁要是靠这些口水沫子当文献专家，当然是为难自己。由此判断哪些人疯了，其实是自己先一步疯了。

这就像后人观察欧洲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基督教分裂。在 1879 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国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独大，教会内部各派无不尊奉基督，无不高扬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并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们众口一词的“奉主护教”，类似前面所说的中国人“奉旨造反”，大家都会在胸前划十字，都会拿圣经说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 A 上帝做科

研，有的是利用 B 上帝倡神学，有的是利用 C 上帝闹民主，有的是利用 D 上帝谋保皇，有的是利用 E 上帝发动战争，有的是利用 F 上帝劝和促谈……对这一个“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团队大惊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拨开历史长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大活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口号有时是真容，有时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时候。

这里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与“保”的一团乱麻。约定一下：这里的“造”通常是指英文里的 Rebellion 和 Radical Factions，“保”，即 Conservative Factions，则是指保守、正统、卫道的一方，一般情况下与权力当局有较多联系。

前造后保或前保后造

前面提到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他们是元老级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号，令地方党政主官们相当恼火，其中一些学子险被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不过这是 1966 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学子们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军队青睐，一跃而为主流派，与军区首长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党，眼看就有坐交椅、进班子、掌大权的机会，嘴里难免多了一些中规中矩的文件腔，于是被“反军派”斥之为“保军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足足争斗了将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场武斗，就是一些工人对那些“眼镜鬼”和“狗秀才”诉诸武力的一幕。

与之相反的是：当地元老级的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北京的红卫兵“联动”¹组织相似，与上海的“红总部”相似，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女，一心保卫地方党政机构，从官方获取过摩托、经费、办公楼等优厚资助，穿上父辈的军帽、军鞋、军大衣引人注目，对黑色群体的抄家、游斗、群殴最为狂热，构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过这也只是 1966 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随着他们的父母以“走资派”的罪名纷纷下台，整个组织迅速瓦解，不少成员悲愤满腔，对毛泽东心怀怨恨。这些人在日后的岁月里或是组织地下团伙，或是转而参加其它造反派，以至 1976 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不少活跃的身影就来自这一群体。

时隔半年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内造外保或内保外造

¹ 联动的前身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东城分队（东纠）、海淀分队（海纠）、宣武分队（宣纠），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弟。随着运动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他们于 1966 年宣布联合组成“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反对“迫害革命老前辈”，反对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聂元梓麾下一大群众组织，在全国遍设联络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很多党、政、军首长结怨。它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视为全国“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聂元梓在校内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她本身就是来自延安的党内高干，两任丈夫也都是高干。因得到过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高度赞誉，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学校登基掌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老佛爷”和“太上皇”。当校内“井冈山兵团”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统论大旗，在宣传材料宣称自己一方是“根红苗正”，“天生的无产阶级左派”，指责对立派出身于“地富反坏右”或“反动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须横加扫荡的旧时代余孽。保守派的逻辑和言词，在她那里几乎应有尽有。

与之相反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所在地原属解放军 341 部队，一个军事工科大学，与我所在的中学仅一墙之隔。该校领导级别高，与省军区首长同吃军粮，但交往不多，甚至颇有嫌隙与磨擦，具体情况外人莫知。军队院校的“文革”启动后，这个学校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在大墙内大造校领导的反，一走出校门却支持省军区，以院领导之敌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主流逻辑。他们把军械库里的武器都给了“保军（区）派”，派出人员给“保军（区）派”充当军事顾问，被地方造反派切齿痛恨。一旦中央表态否定军区的“错误路线”，他们也就糊里糊涂焉了，同其它保守派组织一样云散烟消。

一墙之隔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农村遇到过一位中学校长。他出身贫农，没什么历史问题，只因自己读过高中，在当地算是学历最高，所以招风惹事，在运动初期被当作“小邓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育黑线的代理人”，饱受群众批斗，差一点闹得家破人亡。他对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来，以至多年后还拒绝与有些同事来往，遇到什么红白喜事，若那样的家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个哥，在省城官居处长，却是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斗兵团”骨干，批斗省委书记一类十分活跃，曾被入选什么“夺权”的谈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于，一家俩兄弟，为何一个区区高中生被别人造反，揣着大学毕业文凭的倒在造别人的反？为何小小校长成了“走资派”，倒是处级官爷混在草

民群众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俩哥们凑到一起，该敬酒时相互敬酒，并无势不两立之态，说到对方处境时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敌忾。他们或“造”或“保”的意识形态似乎荡然无存。

看来，利益都是相对的利益。富人眼中的一百元简直不是钱，拿到穷人堆里却可能是巨资。“利益感”依不同情况微缩或放大。权力也是这样，因置于不同的空间而造成感觉多变，遇权力大户时会相对失重，遇权力小户时会相对增重，传导出不同的心理信号。

若拿社会学的尺子量一量，无论看薪资，还是看权势，还是看实际生活状况，当哥的似乎更应该被运动冲击，当弟的更应该乐见政治洗牌。不妨设想：如果那位弟调入省委机关，他的学历不足为奇，级别只够垫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长官数不胜数。别说运动不会顾及于他，依屁股指挥脑袋的常理，他还极有可能参与兴风作浪。换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调县域，成了县委书记或县长，是民众视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别说他没资格造反，据出头椽子先烂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乱民们揪到台上去挂黑牌。

由此可知：

位于社会上层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保守派；

位于社会下层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造反派。

他们的际遇决定态度，位置决定观念，有时只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比如一纸人事调令，就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这样万象纷呈和千变万化，构有一种和平时期的反常内乱。与骆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国学者瓦尔德（Andrew G. Walder）也回到利益视角，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一书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种政治态度通常受制于当事人的社会利益，包括“与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更好生活水准与前景预期”，“那些旨在掩盖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辞下隐形的群体利益”等²。相对于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疯子的胡闹，一大堆电脑中的乱码，这些学者辨识利益动机，梳理行为逻辑，表现出更多的细心，已有很大的改进。正常人——或说“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轮廓开始在这种叙事下浮现，一出僵尸剧重现人的体温和脉跳，还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们的不够之处，是比量尺度还过于单一，缺少相对的、动态的、多样的视角，因此处理更复杂现象时也许举步维艰。比如“出身好”与“出身不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区别依据，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与半年以后的故事不一样，一墙之内与一墙之外的故事不一样，身处社会上层或社会下层的故事不一样……在不同的博弈棋局里，定数之外有不同变量，如果以“出身”解释一切仍是冒险。

² “...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interested aims.” 引自 *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任何一个“文革”的过来人，都不难在自己的记忆里，打捞出对于这种解释公式的几件反证。当然，这倒不是说瓦尔德胡扯，只是说乱中有序，复杂中有简单，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这种“乱”证明了政治选位不过是因地制宜和相机行事，暗中却伏有人们内在统一的逻辑：利益，特别是政治权益。之所以呈现为“乱”，是因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制于不同利益关联圈的结构。身处一个人口大国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种小格局的串结，大利益是各种小利益的叠加。前/后、内/外、上/下就是几个可能交错的基本关联圈；亲友、师生、邻居等人脉关系，知识、思想、兴趣等精神联系，作为非物态的“软利益”在场，也可能形成更多关联圈，以至一个本该参加保守派的哥们，纯粹是爱打球，舍不下一群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

几个圆相切，一个圆心可能同时是另一条圆弧的切点，一条半径可能同时是另一个圆的直径。因此在彼此交错的N个利益关联圈里，利益理性人很难是单面人，总是依据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现出N个面孔。《芙蓉镇》一类电影囿于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蛮、进步/反动的传统二元模式，描述一种单色的、恒定的、绝对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恶”，无助于人们看清多面和多变的真实。

揣上这种人生路线图闯入现实，没几个不碰得鼻青脸肿的。

【书海泛舟】

走出运动治国的误区

（《虔诚与疯狂》选读）

孙 涛

按：本篇节选自孙涛所著《虔诚与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一书自印征求意见本第十一章。这部书稿作者还在广泛征求意见和修订中。

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关和的理念，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许许多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讲究民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些文化精髓，国人耳熟能详。

但历史老人有时却只能看着历史走入误区。

据官史《当代中国的山西》披露：山西省在1949年前后确定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约6万人，直到1980年7月才给51900名“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省错划右派分子11274人；在“四清”运动中确

定了 96800 个案件，1980 年 7 月复查 94600 件，纠正错案 6500 多件；及至文革，又在夺权、清队、一打三反、追查 5 · 1 6、整党、揭批清等诸次运动中，构成冤假错案 23.86 万件，总共涉及受害人高达 103.1 万人。

这就是历史！而有些运动涉及到的受害人，这部官史还没有统计。

1949 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直到 1966 年开始，十七年间，毛泽东不停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下面这些较大的运动，历史潮流记忆犹新。

一、关于加强和巩固政权的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二、关于加强思想统治方面的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工商界整风运动；

反右派运动；

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

农村四清运动；

三、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公私合营运动；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大跃进运动；

大炼钢铁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其他方面的运动：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扫盲运动。

以上这些运动，全是领袖发出指示，下级层层贯彻，广泛发动群众，对准反

面典型，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夺取最后胜利。在一些运动中，还要下达指标。镇反杀人有指标，反右戴帽有指标，连除四害，都要下达指标。

建国后的十七年间，户口的城乡二元制，区分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人群，城市人口的生活，明显优于农村人口。在这两类人口中，又出现了“地富反坏右”一批“贱民”，他们的子女，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经济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各色劳动者，只能依赖现行的体制生存。在党内和民间，思想的禁锢，让如彭德怀那种敢讲真话、实话，敢质疑现实的人，已经没有了话语空间，党内和民间的思想被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自由表达意见的途径被全面封死。理论上的混乱，在党中央向国内和国际上连续发表的“九评”中，就是一种表现，而在党内和民间，却不容许有另外的声音。全党和全民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斗来斗去，终于迎来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文革大运动中，又套进去各种不间断的运动，党内斗争和全国的内斗，也就在运动治国的环境中，达到了巅峰状态。

文革，是运动治国的延续，也是运动治国浪涌的集大成者。

于是，在文革中，就出现了一种让后人似乎无法理解的现象，无论党内党外的各种派别如何厮杀，双方都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激昂口号，都在以自个的行动，不惜以流血和生命，演绎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悲剧。

运动治国，损害的是人的良知，和人的生命，破坏的是国家的秩序，和经济的发展。

让我们再读一些具体的数字。

在文革的十年内乱中，全国的经济损失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先从一只“麻雀”说起。据国家大型企业太原重机厂建厂 60 周年有关资料回忆，1967 年到 1969 年，即太原武斗最盛的那三年，该厂给国家造成 55000 吨机器产品和 4000 万元利润的损失。

再以太原为例，《古都腾飞——太原经济述略》（郝小军、王建设、齐宏明、雷钦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第三版）有如下记述：

这十年，把三年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冲刷得一干二净，使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下出现蓬勃生机的工业生产重新陷入了严重混乱的境况。

十年中，全市工业经济以至整个经济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社会总产值下降了 0.2%；工农业总产值下降了 1.4%；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4.3%；地方财政收入大大低于 1958 年至 1966 年的增长速度。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7.2%。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合著，2005年1月版）一书中，作者根据李先念1979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对文革中全国的经济损失作了如此概括：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数字所包含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整整30年中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这就是我国国营企业的全部家底。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经过30年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同样一份家当。

据李立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山西》记载：

据统计，山西“文化大革命”中除去武斗死亡的人数，非正常死亡19998人，其中许多属于被迫害致死。

19998人！李立功是以省委书记身份主编《当代中国的山西》这部史书的，此书也属于官史。那么，文革中，山西各地的大小武斗中，那些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将鲜血流尽的无谓的牺牲者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这恐怕是官方难以统计的一个数字了。死者，生命已经长逝，生者，怎么能忘记他们的悲剧呢？

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上至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包括知识分子们，下至工农大众们，在不断的政治动员和党报的文章宣传鼓动下，互相撕咬，彼此揭发，将良知付于东流，把邪恶奉为正义，随着最高领袖不断发出的最高指示，民众响应冲杀上阵，极左的浊浪，早淹没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内斗之惨烈，真个是史无前例。

至于文革中间，受到迫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央视在1998年改革开放20年大型文献纪录片解说词中提到，“文革十年造成了约三千万件冤假错案”。而文革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对广大青少年人生观、道德观的侵害，则是官方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历史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在祖国大地上，从官方到民间兴起的国学热、文化热、正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文革的绞杀后，正在复苏中迅速地繁荣起来。这也再次证明，那场文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倒行逆施是行不通的。

文革在毛泽东心中是一件伟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人家在他造的这种伟业中，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时，华国锋迅速将其夫人江青和其侄子毛远新拿下，要结束毛泽东的这种伟业。之后，当邓小平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治国理念，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了改革开放；当江泽民和胡锦涛提出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时；我们回头再看毛泽东时代运动治国的误区，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对历史的反思和前进之不易。

中国的社会，太需要改革开放了。

中国的经济，太需要急速发展了。

从党内到广大民众，太需要解开疙瘩，团结前进了。

重新浴火重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快快复苏，以神州大地深厚的文化基因修复多年来运动治国给国人心中留下的伤痕，真是紧迫而现实，路远而任重。

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10年文革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毛泽东。反革命集团何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是也。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四人帮”呢？王洪文是在林彪死后，毛泽东亲自提拔的又一个接班人，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毛泽东搞文革倚重的秀才笔杆子。要说利用，是毛泽东先利用了他们，他们又利用了毛泽东而已。《决议》中的那种表述，为尊者讳的文字运用再清楚不过了。

10年文革是一段政治历史，却绝非毛泽东一时兴起而为，其源可以从1966年再往前探寻，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中共高层斗争的延续。10年文革也是一段文化历史，在毛泽东刻意要砸烂所谓旧体制而制造的文化荒漠上，却在全国涌现出无以计数的年轻人，在紧跟领袖的革命和造反中，强化了旧体制里业已存在的领袖专断、思想封闭和随之而来的个人迷信，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从中共走上神坛的最高领袖，延伸到民间普通百姓的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其源更深更广，可以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积淀中去探寻。但探寻历史原因是一回事，现实是，官方总要拿一些人来为这一段逝去的历史承担责任。

1983年，中共山西省委开始按中央部署，在整党中清理“三种人”，刘灏再次成为革命对象，两年后，被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报请市委批准，开除了党籍，同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成了太原市北郊区一名普通职工。当时的区委书记李海恒在与刘灏谈话时，就明确告诉他说：“对你如何处理，全是上面的意思。”太原市北郊区那块土地，终于成了刘灏前半生的归宿和后半生的

开始。

对刘灏的政治结论是“三种人”。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当年官方的解释，是指“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打砸抢这种行为，比较容易界定，但“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则在界定中弹性极大。

以刘灏为例，他起来革命造反时，中央高层尚未形成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更没有“四人帮”一说。如刘灏这样的中学生们，是听从毛泽东的号召，按照党中央文件精神，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指引，积极投身文革的革命小将。他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被中央肯定为左派革命组织。谢振华主政山西后，刘灏听从谢振华的安排，经过学习班炼狱般的七斗八斗和自我检查，又下乡锻炼，才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谢振华没有上了林彪的贼船，刘灏自然也没有追随林彪了。至于和“四人帮”，刘灏更是没有丁点儿关系。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王洪文主持中央会议批判谢振华，而刘灏却是支持谢振华的基层区委副书记。追随“四人帮”批谢振华的，不是刘灏，恰恰是接替谢振华主政山西的王谦。说刘灏“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没有根据，但他曾是山西一大派组织“兵团”的司令，是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这是事实。把“三种人”的界定范围一扩大，一摸棱两可，就可以定性了。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 1983 年 4 月 23 日联合下发的 1983 年第 6 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不搞记录在案，个别触犯刑律、当时已成年的学生另作处理。”该文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信任。”在山西的十年文革中，刘灏并没有触犯刑律之事，按上述文件规定，如他这样的中学生，连记录在案都不搞，更不应该给戴上“三种人”的帽子了。

当年红联站的领袖，与林彪、“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的段立生，与刘灏一样，也被定性为“三种人”，被太原清徐县委报请太原市委批准，开除了党籍，撤消了一切职务。当年红总站的核心人物、原东风兵团的司令黄锐庵，与林彪、“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听命于刘格平和其夫人丁磊，曾向山西省委夺权是事实，也被开除了党籍，定性为“三种人”。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是名工人，并非中共党员，也被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公职。

对与刘灏相似的干部如何处理？中央当时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可举原省委机关七一公社的负责人李辅为例。“四人帮”倒台后，任襄汾县委书记的李辅，与刘灏、段立生等年轻干部一样，曾被王谦整肃，中央派霍士廉取

代王谦后，他被平反。1981年5月，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以李辅作典型，说他文革初期造过反，但没有参与打砸抢，本人有工作能力，在基层干得也不错，像这样的干部该怎么办？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习仲勋等首长当即表态：像这样的同志，仍要作为党的优秀青年干部来培养。李辅被重新启用后，担任了平遥县委书记，成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政策的践行者。胡耀邦作为文革后党内思想解放的先驱，深知对年轻干部不可一棍子打死，改革开放会让他们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到了1985年，霍士廉调走，省委书记易人，李辅还是被省委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同时撤销了一切职务。

曾任昔阳县委书记，后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的侯光天，始终拥护和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任昔阳县委书记时，在前任书记刘树岗工作的基础上，尽快落实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遗留下来的三千多件各种政策问题，领导全县人民抓农田水利建设，大搞植树造林，涵养水源，改善气候条件，通过干部年轻化，改变了全县因文革形成的干部帮派现象，调整了产业结构，全面落实生产责任制，这一套解放思想，致富昔阳的工作方针，使受极左思潮侵害严重的昔阳县全面拨乱反正，走上了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因政绩突出，被调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但因为文革时期在校时，是8·8一派的领导人之一，有人揭发他在1967年11月19日两派的武斗中，对当晚的烧楼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先被记录在案，接着在1987年2月被免去了晋中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再不给安排工作。

对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兆田的处理，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卢功勋在1987年10月6日省委召开的老干部会议上，在所做的情况通报的报告中，有一段说明：“还有一类是像原省水利厅李兆田那样的特殊情况。李兆田在文革一开始就积极造反夺权，是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头头，曾策划组织过两次武斗，造成四十人死亡的严重后果。73年末至74年上半年，参加了张珉、赵凤岐组织的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表现积极。75年被逮捕，后判处有期徒刑十年，79年3月平反。核查开始后，对这个人的认识一直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认识是，李在文革前期确有问题，但后期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并受迫害，是觉悟并付诸行动的表现，前期问题不必再追究。另一种认识是，李反对‘四人帮’并受迫害，已平反，后期是非已分清，前期问题严重而从未处理，应重新作出严肃处理。对这一问题，我们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究讨论，采用了‘不定性、不处理、党员不登记’这样一种特殊的办法予以解决。做到了既分清是非，又解决了问题。对类似李兆田问题的其他人，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同样收到了好的效果。”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 1983 年 4 月 23 日联合下发的 1983 年第 6 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还明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信任。”李兆田文革初起时，紧跟领袖造反，因根红苗正，被推为一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文革的进程中，他又成为反思文革，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且在工作中有干劲，有能力，在‘不定性、不处理、党员不登记’后，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样对待一名领导干部中由参与文革，到反思文革，再到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如此处理，果真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吗？

山西清理“三种人”从 1983 年年底开始，到 1987 年结束，“先后列出核查对象 2126 人，查清问题的 2070 人，结案 1986 人。定为“三种人”的共 285 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 672 人，维持原结论的 52 人，非党工人中问题严重，采取不定性，把问题如实记录装入本人档案的 111 人，问题严重，因情况特殊采取“不定性、不处分、党员不登记”和“不定性、不处分、记录存档”的 13 人。（摘自 1987 年《卢功勋同志在省委召开的老干部会议上关于全省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情况通报》）

毛泽东当年害怕他死后，有人否定文革，主持中央全会否定了文革的邓小平、陈云，恐怕也担心他们百年后，有人再以党中央的名义，去翻他们定的案来肯定文革，所以，他们力主把所有在文革中当过群众造反组织领袖，后来被提拔的青年干部，统统以“三种人”之名驱入另册。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首长的想法，自然被抹掉了。

在山西，曾跟着康生、江青向省委造反夺权的刘格平等领导干部，曾跟着江青、王洪文批谢，又跟着批邓的王谦等领导干部，并未去承担文革中的责任和处分，而刘灏、段立生、李辅、黄锐庵、郝庭云等一些当年的中学生、大学生、青年干部、青年工人，却分明成了承担这种历史责任的悲剧角色。然而，客观地说，他们，包括与他们一道革命造反的那些省城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以及与他们一样，将领袖毛泽东奉若神灵、按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而革命造反的一些年轻干部们，又能承担得起山西 10 年文革的多少责任呢？再往大里说，在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都有难以计数的被批斗者死于非命。这些冤死者、以及在各种武斗中的战死者和被无辜殃及生命的死伤者，又能向谁去讨还一份该承担得起的历史责任呢？

由于党内外都有人被定为“三种人”，足见处理“三种人”不属于党内的纪律处分。

再以法律而论，在中国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三种人”这种定义。打砸抢者，可以按刑法论罪。参与了林彪集团的人物、参与了“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也可以按参与林彪集团和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一案论罪。而文革之初成立群众造反组织，特别是像兵团、红联站、红总站这样的一大派群众组织，是当时的党中央和党中央领袖支持的运动潮流中的产物，是被当时的党中央文件肯定了的“革命左派组织”和“革命组织”。它们的领袖刘灏、段立生、黄锐庵、郝庭云等，都是要紧跟伟大领袖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年轻人，有革命造反之实，却无篡党夺权之罪。在最高领袖和党中央的一次又一次动员号召下，他们激发出火热的参与行为，正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动员号召进行文革的必然。他们在文革之初都做过红闯将，文革中间也都做过被革命被批判的文革对象，做了官后，也都想做个按毛泽东思想做人行事的好官，这正是他们既有不同派性，又有共同思维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搞过很多运动，“文革”也是一场运动，如历次搞运动一样，党中央总要先发动一批积极分子，借力推动运动，刘灏、段立生、黄锐庵、郝庭云等，就是山西文革运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可拿文革与“反右”相比较。1957年毛泽东要发动整风运动，动员党内外群众和民主党派朋友们给共产党提意见，但这些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们，最后竟被打成55万之众的右派。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是全国的造反大军，群众组织的领袖们，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当毛泽东逝世后，这些积极分子们，又受到整肃，不得不去替毛泽东承担起文革的责任。由此可看出，共产党执政后在抛弃人治，走向法制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想就刘灏这名中学生、段立生这名大学生和黄锐庵这名青年干部三个人的命运，做一次假设。谢振华在山西主政后，山西政局正在渐渐平稳。刘灏完全可以去北大当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从此跳出山西，留在北京，生活在父母身边；以段立生的能力，也完全可以调出山西，去省外的某一个大城市工作，或从政，或搞某种专业发展自己；至于黄锐庵，与妻子全是广东人，如能调回广东，一定也能成为改革开放中的活跃人物。如果我的这种假设成立，他们的人生将是另一种命运。为写作此书，我曾和刘灏、段立生、黄锐庵分别在聊天时谈过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却变不成后悔药。在文革时代，他们无疑是时代的精英。他们只想按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理解，对党中央文件的理解，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既没有登上林彪的贼船，也没有被江青的“四人帮”网罗。在山西的三大派争斗中，他们更没有如杨承孝那样，因挑动和指挥武斗而背上了血债。正因为他们不是碌碌无为之辈，正因为他们一心想参与文化大革命，并在山西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所以那个时代，他们组建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并被拥戴为领导。错误的时代潮流，最终让他们收获了人生的悲剧，这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历史现象。他们投身那场大革命时，是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并非私心驱使。他们发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肯定的革命行为；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心想跟着领袖在文革中建功立业。紧跟毛主席，忠诚毛主席，是文革年代无数年轻学生、年轻工人、年轻干部发自心底的心声和不可质疑的信条。还有一点不可否认，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让他们在文革中又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经历了炼狱般的七斗八斗之后，还是舍弃不了后来到手的官位，并希求在已经坐上的官位上，继续借文革之势上升。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当领袖将全党全民领进死胡同里自相残杀后，文革结束了，领袖睡在了纪念堂里，曾不断地给他们送来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那些让他们精神振奋投入文革的白纸黑字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已成历史，现在，又以另一种权威的腔调发声了，而他们，却不得不继续留在死胡同里，做了文革的殉葬人。

【书海泛舟】

《毕竟东流去》序

王醒民

按：李自茂著长篇回忆录《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毕竟东流去》记录了本书作者李自茂生活中的主要经历，可以视为作者的自传。

李自茂和他的妻子黄雅岚，都是我的清华校友。我们都是在一九六三年考入清华大学的。我们的经历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出生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在国共内战中度过了孩提时代。虽然我们也是战乱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但是因为过于幼小，我们对先辈们所承受的深重灾难缺乏记忆、理解、和真切的感受。我们真正开始有比较连贯的记忆和日渐增长的悟性，应该是在新中

国建立之后。我们都出生贫寒，在穷街陋巷中长大。那个时代没有电脑、电视、ipod、ipad、智能手机……等奇技淫巧。即令有，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缺吃少穿的孩子。我们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打弹珠、拍画片、跳绳、踢毽等，甚至瞒着家长，冒着生命危险到湖泊、河流里去泅水……但是当年我们享受到的童年乐趣，似乎一点不比现代孩子们少。贫穷的生活是艰辛甚至残酷的。为了分担家庭的困难，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们出去拾煤渣，打零工，扛水泥，回收废品……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屈辱，反而感到欣慰。为了改变生存状态，我们自幼便有志于学，有一股与命运搏斗的倔强。所以贫穷是严厉却又心怀大慈悲的教师：她让穷人家的孩子更早地领悟到求生之不易，学会奋斗和承担，为他们未来的生命旅程预作准备。

“美丽的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当我们踏进清华大学校园时，就听到这样的描述。仅听这句话，这所华夏名校的使命似乎是要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一个经历了百年颓势和战乱的古国，面临重建和光复旧物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地需要这样一支力量。

但是，这样的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清华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革命接班人。当时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领导，提出了要创造悠哉游哉的宽松环境，让清华的学生能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得到全面发展。在德、智、体三方面，学校为学生树立了很高而又具体的标准：德，成为共产党员；智，成为研究生；体，成为运动健将。在当时，这三个目标中，要达到任何一个都非易事，更遑论三项中的。可是清华大学就有那样的怪杰，硬是达到了那样的高度。有了具体的目标和榜样，年轻的学子们便全力以赴，力争上游。刚进大学时，饥馑岁月尚未结束，可是清华大学学生的精神面貌是健康乐观，锐意进取，面有菜色，而心怀天下。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以民族的复兴为己任。那时清华招生一年不到两千，被录取者哪个不是当地的佼佼者？如今聚集一起，要想不落后于人，哪个敢掉以轻心，稍有懈怠？当时图书馆的容量最大，因为聚集在那里苦读的学生多，自然形成一种催人上进的气氛，便成为学生课后自习的首选。每天图书馆还未开门，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龙。及至门开，人流便汹涌而入，瞬间将所有座位占满。

清华有刻苦学习的传统，但是不主张死读书，而是千方百计地教育学生注意效率，养成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生活习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清华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的喇叭一响，学生们便从图书馆里、教室里、宿舍里倾泻而出，几分钟的时间内，校园里所有的空地上便熙熙攘攘，到处都是锻炼的人群。田径、球类，无所不有。偌大个清华园尚显不足，航海队便去昆明湖练舢板，长跑队可以一直跑到香山。为了促进体育

锻炼，清华有一支竞技水平很高的体育代表队，不少队员都达到了国家等级运动员的标准。李自茂和黄雅岚不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都是体育代表队的骨干。在清华养成的良好锻炼习惯和身体素质使无数清华毕业的学子终生受益，帮他们在日后的逆境中度过难关。

社会上常常会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理工科的学生，崇尚实际，虽长于格物致知，却往往短于人文思维，浪漫情怀。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这样一种刻板的推断，完全不适用于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考入清华的学生，在中学里不但是数理化等自然学科中的佼佼者，而且很多也是人文学科中的佼佼者。他们本来就对人文科学有良好的悟性和不错的修养，学习理工是他们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出于考虑未来就业的无奈。其次，清华这所中西结合的学府，有着开放的精神、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人文传统。清华大学的文艺生活非常丰富，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等各方面的社团无一不有，为有兴趣的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精神和展示才华的机会。清华文艺社团的表演水平不逊专业团体，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作家、诗人和记者。在这样的环境里，李自茂展现了飞扬的文采。

凭借优良的种子，肥沃的土壤和宽松的环境，清华能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造就一大批优秀人才，实非偶然，毋庸赘言。故坊间有“大清帝国”的戏言，亦不足为怪。

李自茂和我在清华度过了三年平静、愉快的读书生活。在三年级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清华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悲愤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化大革命一到，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这时身为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成为革命对象，已经无法呐喊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件、人物的是是非非，如今是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这场革命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也难评估。这些都远远超出这篇序文所想涉及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说，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大学为大多数的学生所制定的“红色工程师”的人生规划。从此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作为大三的学生，我们是青涩的，极其缺乏人生阅历的。我们不缺的是幼稚，是理想主义，是青春的热情。“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诘问，让我们热血沸腾。于是，我们带着各自对这场革命的理解和憧憬，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由于不同的选择，清华的莘莘学子们从此分道扬镳了。有的从此逐渐步入平坦的仕途，甚至跻身于中国政坛高层，有的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有的下海经商，成为巨富，有

的飘洋过海，浪迹天涯，有的身陷囹圄，迭经沧桑，有的甚至已经命丧黄泉。在文革期间，李自茂由于忘我的热忱、行事干练和敢于承担的突出特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派的中坚力量。这也为后来他的坎坷经历埋下了伏笔。

李自茂和我们都属于命运多舛而又因老天的慈悲而得以幸存的一群。一九六八年毕业前夕，我因为得罪了在清华掌权的军、工宣队，被分配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有幸占得清华仅有的五个插队名额之一。一年多后，我写了一篇《煤油灯下的报告》，受到迟群青睐，被召回清华，在政工组做文字工作。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又遭人揭发犯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天大罪，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劳改生涯。在此期间，命运让我与校长蒋公南翔先生成为“改友”，师生遭罪，同病相怜。文革既毕，蒋公秉公仗义，力排异议，助我平反昭雪，使我其后考研、出国，在美洲大陆展开生命新的一页成为可能。

李自茂分配方案比我略高一等：他被分到四川渡口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渡口虽说属于“巴山蜀水凄凉地”，但是工人阶级毕竟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比起贫下中农来，要更胜一筹。当我在冀北原野满手血泡耨大田时，他在金沙江畔挥汗如雨，抛砖、装沙、卸水泥。分工不同，接受“再教育”的强度毫无二致。

李自茂毕业以后的生命旅程与江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驱使他由金沙江、荆江、扬子江顺流而下，由渡口至武汉，再至上海，程程艰辛。特别是在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及后来的清理“三种人”时，他在清华当过“造反派头头”的经历，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审查对象，身心所受的煎熬非局外人可以想象。但是他在生命的逆境中从来不曾颓唐放弃。相反，他耐得住寂寞，潜心学习，坚持译述，著作颇丰。重回技术工作后，勤勉敬业，成效显著。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他思想敏捷，洞察先机，毅然投身实业。他关心员工利益，行科学化、人性化之管理，时日不多，便将企业料理得风生水起，业绩可观；闲下来又偕一帮“驴友”遍访名胜，蹄迹寰宇……不能不说李自茂有胆、有识、有谋，活得非常精彩。

李自茂为人大气，不扭捏，不矫情，不护短。文如其人。他的这本书写得真诚、流畅，内容纷繁，但是剪裁得当，不显累赘。他没有为自己坎坷的经历哭天抹泪，相反却以轻松的笔调，生动活泼的语言调侃、逗趣，讲述他如何交友、处世、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向世人展示了自己豁达的胸襟，文情并茂，亦庄亦谐，常常令我忍俊不禁，难以释卷。

有道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李自茂是深受大江精神的熏陶和庇佑的。读罢，掩卷沉思，感触殊深。李自茂绝非心怀偏见的短视者所构陷的“三种人”。若非以“三种人”冠之，他应是：一多才多艺，智商极高之人；一挫而弥坚，情商极高之人；一老天眷顾，奋斗有成之人。

人生大幸者，立德，立功，立言。对李自茂而言，早年逆境频繁，欲挫其锋，

夺其志，而终未能逞。

立德，立功，立言，李自茂不输他人。

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时期，李自茂和我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正因为如此，我们能互相理解，同情。我对他的命运有一份由衷的关怀和深厚的兴趣，对他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有着诚挚的敬佩。

因此我感到十分荣幸能为此书作序，向读者竭诚推荐。

2014/1/21，于拉斯维加斯

【书海泛舟】

有关武斗的一些思考

（《毕竟东流去》选读）

李自茂

按：本篇节选自李自茂著长篇回忆录《毕竟东流去》第三篇第三章，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李自茂，1945年生于辽宁。1963年入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学习。文革中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骨干成员，“28团”发起人之一，清华“百日大武斗”中西区武斗负责人之一。此后历经“五一六”、“三种人”等反复清查，辗转四川渡口搬运装卸公司、攀钢、十九冶、宝钢冶金建设公司等多个单位，

1993年创办上海大和格栅板有限公司。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现居上海。（右为作者近照）



武斗可以避免吗？

武斗产生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不可避免的一面。

两派都自认自己一派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都想争得正统的地位。而在缺少民主土壤和传统与习惯的条件下，只有诉求于传统：让中央表态。

自文革伊始，在每个转折点，无一离不开“中央表态”。所以我认为文革的“造反”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例如我，算什么“造反派”呢？我没造过任何人的反，都是跟着报纸、讲话的调子走。但这时海军宣传队的撤出给了暗示：中央不管，至少是暂时不管。在“大民主”的氛围中，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武斗”。此前全国各地武斗四起就是最好的注解。“文攻武卫”的口号恰合两派的心意。如果说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字报，大辩论还有一定的民主性，在一定的范畴内尚可自由地表达心声，而当群众组织形成后，必然产生利益的追求，即所谓的“派性”，两派互不相让，互不妥协，冲突不断。

有论家摆出一堆两派的分歧，什么红线黑线，什么砸烂砸扁，什么干部问题，等等等等，其实全是表面，一地鸡毛。两派争夺的焦点是权力，故此大联合的纲要便是名额分配。

早在1966年时，就可发现暴力的影子：辩论中互抢话筒乃至互相推搡。1966年8月24日，以高干子弟为领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感到在舆论上不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风时，遂请来了数千中学红卫兵到清华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撕毁了所有不顺眼的大字报（内有少量反刘少奇的），顺势推倒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二校门，已抛弃了民主的武器，动用了暴力手段。

但历史也是健忘的，由于“老子英雄”，今天那些“左派”儿们早就逃避开了“造反”的名号，个个成了“好汉”，进入庙堂。因为“造反”不再时髦，不但不时髦，反成了“罪行”的代名词。至于当年他们那些打、砸、抢行为，不过是点小毛小病，不足挂齿，与“右派翻天”的行为有天壤之别，天下交给他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地下才能睡得安稳——痢痢头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好。

清华团、四两派形成后，互相间常发生砸喇叭，冲击广播台，乃至斗殴的事。1967年底，明斋、科学馆等地已成禁地（据孙维藩日记，科学馆在1967年12月已修筑了铁栅栏），双方剑拔弩张，将支持对方的干部抓起来，大字报和广播充斥了漫骂，“民主”已消失得没了踪影。双方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积极准备着武斗，但又不肯承担挑起之名，乔装出一副“武卫”的弱者姿态。在这样的态势下，追究哪一派先挑起武斗是毫无意义的。不能凭蒯大富或沈如槐今天回忆的几句话而断定是团派或四派挑起了清华的武斗，当年的语境多是豪迈而夸张的，行为和结果却无法篡改。犹如两个小孩打架，一个巴掌拍不响。

清华的武斗的发生不是意外，也不是蒯或沈可以左右的。同样，武斗也不能归结于某些人的好斗或“暴力倾向”。政治事件从道德层面解释必然陷于荒谬。

时至今日，在回忆清华文革往事时，仍有一种见解说是团派挑起了清华武斗，或者说是蒯大富挑起的。论者甚至引蒯的话作证：“当年要是我说不打了，清华

是打不起来的。”蒯大富在做历史的假设，可惜这假设的后果不可能成立。蒯大富讲这句话时还沉浸在“领袖”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以为自己真能左右当时的形势。我当年也反对武斗，也认为清华不会武斗，然而毕竟发生了。分裂的结局只能是武斗，除非中央迅速干预，而干预是迟迟的。1968年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的肇始日，是你蒯大富叫打的吗？不是！团派攻打旧电机馆连团派武斗指挥部事前都不知道，是红缨战团自发的决定，并以此开启了百日武斗。同样的，4·29武斗，5·30武斗，都是如此。四派的朋友倒是从不承认自己挑起了武斗。本文也并无意认为武斗是四派挑起的。

武斗仅是分裂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孙怒涛兄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在《良知的拷问》中反思说，如果四一四不成立总部，以串联会的形式存在，两派很可以正常的“大民主”手段争论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初闹分裂的人应当挑起武斗责任的担子，至少是在道义上。

人们都说历史没有假设，这只在认识现代状态的层面上是正确的。但回顾历史或研究历史时，假设也不可免，假设可以把握后来。太史公就常用假设。通过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行动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从而给予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唐伟不退出总部，假设三纵队不成立串联会，假设串联会不成立独立的总部，——清华文革会如何走向？

当文革被否定后，大量的人物发出了声音，述说着当年自己是如何抵制乃至反对文革的事迹。确实，社会上有着各色人等，各种社会阶层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明里，主要是暗里反对或破坏文革的肯定大有人在，而破坏大联合，从而改变文革走向，当是一个重要方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清华两派分裂定有外来的、上面的影响，“追后台”的思路毫不奇怪，尽管追不出来也罢。

四派的朋友嘴上不大好意思说自己是抵制文革的英雄，但却乐道于“全身而退”，以事后没挨整、多人登高位为佐。推敲起来，这类佐证力度不够，况清华还有迟群掌权那一段。

清华人都知道，迟群乃至整个清华军工宣队是显著偏向四派的。所谓“支左”就是支派，当初动农系的工宣队倾向团派，待了两个多月就被迟群赶回了原籍。这本不奇怪：7·27那天是老团打了工宣队。在派性的领导下，对老团下手必然要狠点，对老四必然要轻些，能不追究也就不追究了，例如打死人的事，有人问为何老团里打死人的一个没漏地受到了惩罚，老四那边的却“全身而退”？缘由就在这里。有人辩解说是老四聪明，多条长矛一起刺杀，就可逃避惩罚，这虽有些道理，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关键是工宣队不追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此外，登高位者就那么光彩？君不见当今的寰宇竟是谁人的天下？

窃以为，老四若要标榜正确，实应从大局上着眼。从大局上看，四派最应宣传的当是自己闹分裂致武斗，让文革声名狼藉，人怨天怒。这样四派才不会陷自己于悖论。

“卷入”武斗的人

武斗的参与者多和我一样，一群天真的书生。这些人自觉地参与了文革，抱着理性的追求，怀着平等的憧憬，喊着同样的口号，出于种种原因和心态，卷入武斗。武斗本身并非是他们追求，也不由他们所左右。在评述这段历史时，必须很好地把握这个基本点，不然就会走偏，失实。

唐少杰在他的文章中说“团派准备了四个梯队”，那是高抬我了。唐教授坚持认定，选择“5·30”，“是为了纪念去年同日同时，团派广播台广播周恩来不来清华参加革委会而致使成立活动夭折的通知，矛头所指，昭然若揭”，更是空穴来风，尽管我曾当面解释说，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他仍然如此笔述。他不是亲历者，我想他一定是有所依据。他所依据的当是校内的档案材料，而那些材料是迟群统治清华时期以明显偏向四派且采用高压手段获取的，很多都荒诞不经。

沈如槐在其回忆录中叙述当时四派开会分析，团派会在“5·30”这天搞个行动，且可能是攻浴室，以纪念一年前的革委会的流产，故做了充分准备（东区在吴栋身上发现的条子是为佐证）。团派“5·30”确实行动了，也确是打浴室。唐少杰据此认定，“昭然若揭”，不相信天底下会有如此合乎逻辑的巧合。

可见，据有第一手材料也并不都可靠，那些材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形成的，有许多粉饰、掩盖、讹传、水分、扭曲、夸大或缩小，仅从“昭然若揭”这类文革流行语就可窥见端倪。

如果说两派都没有利益的驱使，也是大谬。学生的利益并不在经济，而在于政治，在于追求政治正确。如果自己的一派被上面否定了，其结果可能会影响终生。这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有所反映，在《燕园风云录》（清华校友网内有转载）里也有披露。团、四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本的目标是争夺清华的领导权。在强权政治的大框架下，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着真理。

对权力的认识上，四派似乎比团派更自觉，因而才能想到一年前那一天的意义。

当年我认为1967年5月30日放弃成立革委会是蒯大富最重大的错误。当时我认为，既然谢富治表态说你们一定要成立的话，他可以来参加，那就应当借坡下驴。如果当时成立了革委会，四一四就会垮掉，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观望，除了

骨干，绝大多数是在看领导权落在哪里。当年我就骂过老蒯真蠢啊，遗憾的是其时我不在领导层，没法与之争论。当天宣布“缓期”后，四派头头就如打了鸡血针般地亢奋，队伍也便迅速扩大：联合本就不牢固，此时透出了获得权力的曙光。

前面说了，参加武斗的人，并非是有暴力倾向的。我接触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决非可用“暴力”以诠释。两派留下参与武斗的人，绝大多数是那些文革伊始便自觉、积极参与文革者，抱着理想的追求，怀着一腔热血，坚信毛泽东的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抱着“进行到底”的决心，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武斗发生后，他们面临着两个抉择，或者离开，或者参与。离开意味着退出，有悖于“到底”的信念。多数人便认为，既然要求“文攻武卫”，武斗不可避免，它就是文革的一部份。（下图：李自茂 1964 年在清华闻亭留影。）

我本人在“4·23”前一直就是反对武斗的，也不相信能打起来。早在 1968 年 2、3 月时，北京的北大、钢院、轻工等校已先后发生了武斗，清华内也出现了武斗不可免论，我同宿舍的有人准备了钢管，还被我制止过。刚打起来时，我



也有过动摇，但因在派中处于一定的负责地位，摄于舆论的压力而选择了留下，担心被本派的人视为胆怯，骂成“逃兵”。当年我的母亲到学校哭着劝我离开，我拒绝的理由就是“别人会骂我是逃兵”。一旦选择留下，我就按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积极而认真地参与武斗。

所谓“武卫”和“武斗”，谁又能把它们区分得开？那时认为，既然打起来了，就一定要取胜，把老四赶出校园，唯此中央才会表态。“5·30”后，我带西区占了土建基地，目的是北町 8 号楼，南扼焊接馆。老四放弃 8 号楼退入科学馆后，我认为重点应是压迫科学馆，老四一旦失去

科学馆，在清华就站不住了。于是我又把人带进荷花池病房，以迫使老四不敢出科学馆到工字厅活动。不久老四果然放弃了工字厅。而我在 7 月 3 日清晨爬在工

字厅西土包包处观察“敌情”时竟中枪受伤，幸而是脚不是头。那是老团打的（我并不认为打我的人缺一个对我的忏悔），由此结束了我的武斗生涯。

客观地说，在整个武斗期间，西区的老团没人刺伤或打死老四，甚至没捉过、打过四派的“俘虏”，除张庚（我受伤另当别论）受伤外，也没别的受重伤的。这种让人稍感自慰的结局应当说与我当时的心态有一定关系。我的心路历程应是绝大多数参与武斗人的内心写照。

当年有许多“逍遥”派，但多数并非是认清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文革本质而逃避，有他们自身经历的原因和心路。在舆论层面，在自身认识上，“逍遥”当时并非是光彩铭牌，逍遥者本人在总结自己时并不承认自己是逍遥，也多是说自己如何如何“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等等。在毕业时个人写的自我鉴定中，人人都先肯定自己是个造反派，积极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墨迹已干，也不能全部忘却吧？这不奇怪，那时几乎没人认为文革不对，不积极参与才是错误。今天，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当年因认清文革而逍遥云云，人们真应视其为我们那个时代的骄傲。

派别的划分只能大体地说个一二三，用“痞子”非痞子来区分两派，本身就是个痞子观。

两派的分野从文革前的人际关系倒是可以看出端倪，如我所在的汽九二班，团派的在文革前多与我关系密切，四派的则与团支书关系较好，而我与团支书的的关系并不融洽。我是班长，也参加团支部的工作，当时为了在三年学期结束时，全班都是团员，支部设了两名组织委员，平时开会时团支委总是与我保持一致，而与支书意见相左，班委会的就更不用说了。概因我们几人认为支书做人不够真诚，任何事都是搬出辅导员要这样、辅导员要那样，用我们的话说是“太假”。文革一来，班委会全体和团支委里除了支书外，都与我观点相类，这派别的雏形就已显露。何者痞，何者非痞？武斗中，汽九的团派几乎全都卷入。

当然，就每个人来说，留下的内心心路不会相同，有的是好朋友留下而留下，有的是同宿舍的多数没走而随大流，更有的是家在外地，北京无处容身，回去需一笔路费钱（那时大串联已停止），囊中羞涩而作罢。留下的人，“闲着也是闲着”，卷入武斗很自然。于是，有人热中于电焊，忙于加工铁门，铁栅，练就了一手好活儿。于是，有人忙于做收音机，录音机，业绩斐然。于是，也就有以游戏的心态参与者。我们西区有位“唐吉诃德”，再简称为“老唐”，可谓游戏的典范。他做的长矛、盔甲与众不同：矛身涂以五彩油漆，矛尖拴上红丙纶带，柳条帽涂满红漆，甲具下摆挂着几个铁环，走起来叮当作响。队中他的长矛最长，近4米，他也试过近5米的长矛，发现挠度太大而作罢。他还自制了一把大刀，经常擦拭，明晃晃的，挂在腰间，威风凛凛，从不使用。

说到近似“恶搞”的游戏，想起1967年底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流行一时，内中有句台词：“一枪打死了狗腿子老四”，2号楼的老团有人将这段录音带剪下，粘成一个环，在录音机上放，这句话就反复播放，无休无止。还有用白铁皮做成一米多长的喇叭，发出野兽般的吼声，害得四邻不安（我当时也甚烦，但却制止不住，还是住在2号楼西侧的一些人冲进去要砸录音机才收场），免不了发生冲突。时至今日，过了耳顺，当年的人聚在一起，忆起往事，还会津津乐道，正是这种年青人游戏心理的回光。

英雄情结

参加武斗的人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如虹气概，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

我们那代人从落地开始就被英雄氛围包裹着，胆怯、怕苦、怕死等字眼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正直、无私、负责、仗义和勇于牺牲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在那样的时代，更有一些人故作激烈，出语豪壮，那又是一个狂热而狂躁的年代，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前面提到的小时身上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并非武斗队的人，也没人安排他去攻楼，但见到那个阵势，他便想也没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是内心里的冲动驱使着他。许恭生在老四的进攻面前，老团退却时，一个人落在后面抵挡，那绝非可以评之为“逞能”，而是他知道责任的份量。

尽管我们那时天天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但就其内心来说，并非如此，怕死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共性，不但自己怕死，也特别怕打死、打伤对方。

武斗是兄弟阋墙，是夫妻对殴。尽管口上说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实践上并没有把对立一方看成真正的敌人，同学情还在，良心亦未泯。

记得6月在土建基地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老团把老四的夏群生捉到了，我让人把他带到土建基地，和他谈了很久。我说，团、四之间的矛盾不都是派性，关键分歧是对十七年的评价。我讲的无非是宣传团派的正确，四派的错误，希望他改变观点，站过来，而且留下与我们一起战斗。我与他在文革初期就相识，他是汽零二班的头儿，人很聪明。他说，看来团派的观点更有道理，他决定退出“414”，但他想回家看看。我同意了。第二天他回了湖南而退出武斗。夏群生现在清华做教授，是学科带头人。

武斗也不是战争，这一点当时参与武斗者心里都清楚。自己一派的人被对方人打死了，以烈士名义宣传（也只是宣传），而自己派若打死了对方的人，知情者则众口缄默，没人视打死人者为“英雄”，私底下反指责他们“心狠”（如团

派里对孙华栋之死的议论)。这就是真正的文革武斗。据“5·30”的亲历者沈昆回忆,在5月30日下午西区人到13号楼休息时,郭福新去了明斋,回来描述他看见团派保卫组一些中技校的学生在打刚捉到的俘虏,他向总部反映要求制止。西区一线的人闻此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一致表示不制止虐待,西区就罢战。

高度集权条件下的由上层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只有用专政的手段来收场。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在“答客难”中说,当天下一统之际,士者,“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当最高层终于不再需要红卫兵这把利刃时,当毛决心实现“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战略部署时,两派均在扬弃之列。大军一到,一切云消。

2004年校庆时返清华,我曾填过一阕“西江月”,就以此来结束本文:

不见旧时模样,依稀当年辰光。夜半奔波数千米,俨然“国共两党”。

年少吾甚孟浪,如今依旧荒唐。一笑人间休万事,空余白发三丈。

【书海泛舟】

文革战争亲历者的可贵反思

——读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庞国义

近来有幸拜读到李正权先生所著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发行,部分章节曾在《昨天》先期发表),不禁爱不释手,引发众多感悟联想。作为同样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同城人和同龄人,自然倍感惊喜。

今天,假如在你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或树荫下、茶肆里与本地六十岁以上老人摆谈龙门阵,打听“什么是文革?”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搞武斗!”有的老人还会补上一句:“就是军舰、坦克、打枪打炮,子弹乱飞,到处死人!”

可惜这血腥恐怖的一幕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却是陌生又稀罕的奇闻,他们最多只能从老纪录片中见过天安门广场那无尽的红旗、海啸般的“万岁”声和畸形癫狂的“忠字舞”。然而,那刀剑、枪弹、鲜血、尸体……他们根本无法目睹了解和想象,历史记忆和文革印痕正在自然风化般地悄悄淡去。

如800多页16开本重达两公斤的《重庆市市中区志》,用洋洋洒洒150多万字,从纪元前到公元后,从天上到地下,从苍蝇到蚊子都说了个遍,却对烽火连天、弹痕遍地、毁房死人的文革武斗惜字如金,仅在《大事记》篇目里,用连标

点符号在内共 26 字记载：“7—9 月，市中区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重庆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32 页），一笔带过了 1967 年发生在该区的牛角沱、上清寺、两路口、朝天门、小什字、临江门、解放碑、邹容路、中华路（杨柳街）、大溪沟、菜园坝、李子坝等地的大小几十次武斗事件，留下一大段空白。

更有甚者，不惜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本是官方所为之事，移花接木栽到“造反派”头上，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在《大事记》篇目里白纸黑字写到：“8 月 2 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不堪‘造反派’迫害，于凌晨 5 点 20 分自杀身亡”（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 页）。

而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同样是官方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明确记载：（1966 年）“6 月 21 日，中共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郑思群四大罪状，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里通苏修”（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93 页）。

当年的重大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杰宗正也在 1966 年 6 月 21 日日记中记载：“晚上，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风雨操场开了大会，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同志在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动，广大师生员工振臂高呼：‘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会后，许多同学都赶写决心书、大字报。”（杰宗正文革日记，未刊稿）

此后，《重庆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郑思群被停职检查的消息，以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组织动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郑思群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几天之内出现了数万张大字报。一个多月后的 8 月 2 日凌晨，一直处于工作组严密监管羁押之下的郑思群不堪迫害，在监管住地用刮胡子的小刀片割破了颈动脉血管而身亡。那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尚未发布，该校以及全国均无“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一词。恰恰相反，正是这起市委工作组迫害学校领导的事件，促使该校学生认真思考，不断对工作组提出质疑，直至喊出“炮轰重庆市委”的口号。市委工作组迫害郑思群致死的事件，成为重大师生成立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的催生婆。

真不知堂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如此不严谨的虚假文字出于什么动机写出，又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印刷出来的，或许这正是把关审核者的意图？看来，要靠官方修什么“正史”、“信史”，真实记录反映文革历史的状况实在很难。

麻雀掠天尚留影，难道历史真的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任人欺凌吗？时间过去四十多年，在社会发展到“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掘金时代，民间仍

旧顽强地保留和反思着一段永远擦不脱抹不掉的文革武斗记忆，因为那是一场客观存在而且必须吸取教训不容再次复制的浩劫。《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记载的那场“文革战争”，便发生在重庆文革前期的1967、1968年间，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伤残。作者自觉地以亲历性、研究性、纪实性书写青春时代走过的文革战火，使该书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当年十七岁，风华正茂的李正权，是那个红色年代典型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响应头罩“四个伟大”光环的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指挥号令的党中央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哪怕已经变形为武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了参与史无前例“大革命”的亲身体验，这既是个人的悲哀和不幸，也是反思文革武斗的宝贵经历和活的见证。他作为文革时的一名初三学生，潜力自为，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底见风日长，挥毫提笔，写诗填词著文，以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真枪真刀见血见尸的战争场面，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十分的难能可贵。正如何蜀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

作者多方考证了“战争”一词的概念，从战争必须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体和有组织”三个条件进行推论，分析文革中重庆大武斗的现状特点，将其纳入“战争”范畴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诠释：

交战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派都掌握和使用能致人死命的现代化热兵器和暴力；两派都成立了能够统辖全市武斗力量的指挥部，都有了自己的武斗总司令（外加赫赫有名的“舰队司令”和“装甲司令”），制定了整体的攻防战略部署和各个特定战役的战术安排，建立了诸如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之类直接指挥战争的机构和武装到牙齿的成建制的作战部队。

重庆最早的武斗是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万人大武斗”事件。保守派被压垮后，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这两派之间因“革联会”问题的分歧，一直没有间断地相互实施打砸行动和使用棍棒钢钎之类的“冷兵器”武斗，到7月份后武斗便升级为使用“热兵器”的交火，8月份达到高潮，所以民间一直流行着“八月战争”的说法。本书作者从理论上把“八月战争”及其延续期（1967年7月至1968年9月）的重庆大武斗改称为“重庆文革战争”，可谓有理有据。

那是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有人卷入。重庆当年所辖的八区三县烽火遍燃，狼烟四起，无处不飞弹，无处不见血，其影响和

战火延及四川省内各地。曾在一夜之间发射上万发炮弹，震惊中央上层，令周恩来等感到“痛心”。书中用悲壮的笔触写到：“重庆这座好端端的大工业城市，到处燃起了战火，摆开了战场，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杨家坪、九龙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观音桥、大石坝、黄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枪声不断，炮声轰鸣，你攻我守，我争你夺，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打败了的尸横遍野，打赢了的伤亡惨重……”

“两派势均力敌，阵地犬牙交错。军舰、坦克、大炮、机枪无所不用其极。连刚研制出来、尚未装备部队的像‘三无’（无光、无烟、无声）冲锋枪之类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来，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战役一个接一个，规模一个比一个大。那战斗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岭；那战斗中的英雄，像董存瑞，像黄继光。其激烈程度，与后来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战争相比，也毫不逊色。……”

“论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战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动用的武器之先进，在重庆三千多年历史中，还真找不到哪一场战争能够与这场文革战争相‘媲美’的！真是‘史无前例’！”

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战争过程中的细节，披露了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武斗战争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武斗基地“黄山警备区”和反到底派大本营体育馆的详情，以及“八八海战”、火烧交电大楼、建设厂争夺战、“八一八”潘家坪之战、南岸的战斗等经过情况，还有那些武斗人员数次“逃难”成都等地的生涯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披露了“人民5号”登陆艇上杀俘经过的细节（此节曾在《昨天》31期单独发表），令人感到那个无法无天年代草菅人命事件的可笑、可悲、可怕！

作者曾经迷恋于当时的政治说教，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亡命地亲历过那场血腥战争，吃过不少苦头，遭遇了五次危险，作过六次“坏事”，书中都有了一一交代并作了深深的忏悔，对这场毫无人性的文革大厮杀运动进行了虔诚而彻底的理性反思。

文革史研究最忌讳文革亲历者带有当年的派性。作者摒弃当年的派性立场，在记叙那场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战争过程之中，除当年特定环境下的派性话语运用之外，其余则不扬己长，不避己短，不贬对方，不褒己方，其表达的反思之意是真诚的、客观的、公正的，因而能赢得同样是那场战争中不同派别过来人的接受、青睐和赞许。

文革群众组织及其参与者均无胜者，两派组织及其当年的风云人物都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根据政治需要恣意玩弄于股掌的器物工具，真正的获胜者是那个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争论文革中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是完

全没有必要而且毫无意义的。集中精力，还原历史事实真相，揭露和鞭挞文革战争罪恶，彻底肃清文革余毒，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一书不但客观反映了重庆文革战争的经过和本质，还提出怎样才能制止“文革战争”之类反人类行为再度发生的思考，那就是必须坚持走民主法治的道路，决不容许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地搞高度集权的独裁专制。

书中写道：“要真正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要真正实行宪政，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很可能还需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始终不放弃，坚持下去，中国最终还是要走到民主法治道路上去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归宿，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这是本书作者所看到的希望，相信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希望。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该书作者由于熟悉武斗过程，又曾在兵工厂工作多年，加之多年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对当年发生过武斗的单位尤其是各大兵工厂的历史、现状、产品，以及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各种武器特征有着较准确的介绍，加之文中对武斗各个阶段各次战斗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何蜀在本书序言中称“在一定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是很有道理的。

重庆文革战争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枪支？目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仍可找到一些局部的蛛丝马迹。国营 296 厂（即重庆建设机床厂）厂史有一段记载：“1967 年 7 月至 1968 年 8 月，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厂内外‘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谢家湾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期间，工厂失散步枪 21409 支，子弹 4038125 发，83 名职工（包括临时工）被打死，弯弯大楼等部分房屋被烧毁或炸毁，生产完全停止，工厂遭受严重损失”（《国营第二九六厂史》，国营第二九六厂史编辑委员会编纂，1992 年 10 月第一版〈内部资料〉，第 473 页）。

文中的“步枪”应该是该厂生产的 56 式半自动步枪，数据精确到个位数，可见是查之有据的了，但不知是否包括该厂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们组装成的半自动步枪在战场上同样好使。我们还注意到，在文革战争中普遍使用的该厂产品 56 式冲锋枪、56 式四联舰用高射机枪、59 式二联高射机枪等也未统计在内。文中的“子弹”仅仅是建设厂用于试枪的 7.62 毫米子弹，而生产这类子弹的是另一家兵工厂——重庆长江电工厂，从那里“失散”的子弹更是无以计数。

如果我们放眼重庆全市八区三县范围，加上各区县人武部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人武部或保卫科的枪支（这些单位的枪支无一漏网地被本单位或外

单位的武斗人员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从野战军、地方部队抢夺的枪支以及“自力更生”制造出来的枪支（如“八一五式冲锋枪”、猎枪、“独角龙”等），那么重庆文革战争中使用的枪支数量应该是很惊人的了。

文革战争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硝烟尚未散尽，文革研究和宣传还存在一大片荒漠。偶在网上浏览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及留言回复，发现民间为文革唱赞歌的不在少数，除掉少数文革获利者和文革死硬分子外，大多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他们在网上推波助澜，赞同“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居然不断出现。

这固然与当前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紧密相扣，而当局对文革真相的遮遮掩掩，导致今人误认为官僚集团惧怕文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青年们不知文革为何物，不知文革带给国计民生和中华文化的巨大灾难，反以为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盛大的节日”，误认为文革就是“造当权派的反”，就是那种可以随意批斗贪官污吏的简单举动，而不知文革真正被整的恰恰是大批无辜的弱势群体。

警钟长鸣，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一个很沉重的任务，就是在官方严密掩盖真相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冲破藩篱，把文革罪恶条分缕析，一桩桩一件件暴露在大众视野，开启民智，口诛笔伐，把那个“流遍了郊原血”的文革以及文革武斗——战争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需要我们花费绵长的时间和付出艰辛的努力。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幸存者时日不多，因此着力培养“60后”“70后”一代文革史研究接班人的工作目标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就会产生断代，文革真相就会被掩埋、歪曲、篡改。

巴金老人曾经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前瞻性的战略主张。他在1986年6月15日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过程……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410页）。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实现巴老的遗愿还遥遥无期，也许还要等待另一个或者更多的二十年……

我想，这个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必须具备实物、影像、图片、《文革词典》、文字资料、数据资料，不光有总馆，各地还应有分馆，还应有灾难纪念日（可以是五一六也可以是八一八），还应有一年一度的谴责声讨仪式（就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红色高棉罪恶馆一样）。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细微的系统工程，不光只是昭示上层官僚权贵人物之间的宫廷内斗，还应囊括文革对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以及造成全国数亿普通百姓悲苦生活的恶劣后果，要充分体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样做的目的，要使对文革的揭示和反思由个人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明白，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们知晓，那个可怕的时代决不能复制，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再来一次文革”的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随着岁月的流逝，全国绝大多数的文革实物已经灰飞烟灭，渺无踪迹，所幸的是埋葬着数百名文革战争殉难者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被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了文物范围得以保护，成为展现文革罪恶的最显见最鲜活的实物见证，为建立期望中的“文革博物馆重庆分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重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爱好者们还在努力奋战，他们自愿，自费，冒着风险，排除各种阻力，不辞辛劳地找寻文革真相。更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考验的幸存者，正在以口述、笔录或在键盘上敲打出回忆文字。

珍惜生命，反对战争；坚持真实，反对遗忘。期盼有更多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佳作涌现。借用本书最末的一句话：历史不能封闭，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生逢乱世】

看陈子庄作画

王以时

按：本篇节选自王以时《中国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性、本体性和当代性》（2014年5月10日重庆美术馆“中法艺术交流展”系列讲座之一）。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王以时，1939年生。1960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组干部。文革中参加造反，任群众艺术馆东方红纵队负责人。1967年春夏先后任反到底派文艺界红一方面军、文艺界延安兵团主要负责人，1967年秋任重庆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成员。1970年“批清”中被批斗、关押审查。文革结束后被清查。1985年参与创办重庆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助理、兼职教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87年任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部主任，1988年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89年移居法国，为中国旅法著名画家，加入法国艺术家委员会、法国当代艺术家联盟。1992年被法国梯耶市政府授予荣誉公民证章。此后来往于中、法之间，被四川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任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美术学部副主任、“王以时油画工作室”主持人。

陈子庄（1913～1976），四川永川（今属重庆市）人。1955年受聘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3年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文

化大革命的灾难，是他十分痛苦的岁月，幼子溺水夭亡，老妻疯癫，还有两个儿子去农村，自己的心脏病又常发作，但他却并不消沉，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处境困厄，心地益彻，坚洁自守，画境随之而高逸超妙也。’”（吴凡《陈子庄》，载《陈子庄艺术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其去世多年后，传世佳作在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展览，出现“轰动京华，震惊世界”的空前盛况。其 300 幅遗作 1988 年 3 月 20 日至 27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每天观众高达 1 万余人。（右为陈子庄遗像）



我进入国画领域，有两个偶然的因素，一个是 1962 年，三年大饥荒以后，中央发了一个“文艺十条”，重提百花齐放了，原来美术界一直是轻视国画的，因为国画很难为政治服务，特别是山水花鸟。这个时候又要百花齐放了。当时四川美协在重庆宾馆开会，请了一些国画家在会议期间表演画画。陈子庄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官方美协的重要会议，中午又喝了不少酒，情绪兴奋，我看到陈子庄先生饭后醉写墨荷的潇洒状态，画写实画的人是不可能这样自由的，那张画怎么样，我没太注意，当时也看不懂，但那解衣般礴的状态给我很深印象。我们画写实的人一直牢记徐悲鸿的几句话：“艺术家要像数学家一样严谨”“素描要像数学一样精确”，一点不能情绪化，2B 以上铅笔不准用，只能用削得像针尖一样的 HB 画素描，画一百多个小时，那完全是仔细地去描摹刻画，这样怎么能够释放情感？不可能的，后来陈子庄也说过：画画如履冰临渊，是不可能画好画的。所以当时看陈子庄画画很触动，开始对徐先生那一套有了怀疑，但在会上还没敢谈，只是在会下说了几句对徐悲鸿不太恭维的话，就受到美协一位副主席的严重警告。虽然重提百花齐放，但现实主义是不容怀疑的。当时总的形势不允许我去画国画，我的工作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好在我转到版画上，既能为政治服务，又能从延安木刻传统和新兴木刻传统中得到一些解放，但从此我开始关注了国画，业余时间偶尔也试画几笔。

我艺术思想的真正解放是文革中期，清查“516 分子”时我被单独隔离关押了一年半，林彪事件后放出来，已失去了文革的热情。有次到了吴凡的家，他也刚刚解放出来，不问世事，也是处于比较失落的状态。在当时的环境下，我记得吴凡小心地把门窗关上，怕墙外有眼，他几乎是偷偷地拿出了 40 几幅陈子庄的小画给我看，主要是田园山水，我十分惊诧，简直可以说是震撼。这样的画，我

从未见过，不仅油画没有，中国画中也未见过！这些画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那个时候起，我关门集中学国画了，临摹了很多齐白石、黄宾虹、吴昌硕、任伯年、石涛、石溪的作品，我知道陈子庄曾受这些画家影响。但我同时也学画当时位居主流国画界的李可染和金陵画派的“写生山水”及学院的“写生人物画”。

大约两年以后，又有一个偶然的机，我和吴凡到成都参加美协一个“评法批儒”的理论会，利用会议开大会期间，吴凡约我去见陈子庄。在仁厚街一个破旧的四合院中，陈子庄见是吴凡陪我来，表现得很恭谦，吴凡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美术界第一个发现陈子庄艺术价值的人，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听说我们是在一个很严肃的会上偷着出来看他的，他有点受宠若惊。陈子庄长期受主流美术界冷落，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去拜访他，他非常高兴，所以主动要画一张画送我。

他的家人将一张方桌移到靠天井一边，光线稍好一点，准备画具，看来他是好久未动笔了，他在床下木箱里找了一张尺幅大小的纸铺平，室内立即安静下来，稍许，他选了一支类似小白云的笔，在纸上悬空挽动了几下，就蘸水、调墨、落笔，先是圈圈、点点，直到笔已枯干，再蘸水、调墨、落笔，偶有短促勾线，直至笔再枯干，就这样在频频点染中只反复了两三次，大约十几分钟，一张极具四川浅丘陵地区的田园山水就跃然纸上，意趣盎然。

先生站起来，偏头看了一眼这张画，不言，突然将画抓起，揉成一团，扔到墙角，我和吴凡都愕然。

少许，吴凡说：“不错呀！”

先生摇头说：“不顺。”

接着又在床下找纸，拿了一张约两尺长的条幅纸铺上，换了一支长锋羊毫，笔杆也特长，中间还有节，他说这是一个画陶瓷的人给他的，我和吴凡都去看了一下，很软，很难控制腰力。先生调墨，屋里又安静了。他悬笔在纸的下方随意画了一组圆圈，行笔缓慢，似不精心，然后从右上到左下快速拖了几根长线，轻重、枯润，变化精微，接着调墨，略停。又开始在纸上缓慢地画圈圈，犹如信手写字，时左时右、时上时下、直至满纸。

先生放下笔，摇头说：“还是不顺……没得意。”

吴凡说：“好久没画了吧？我觉得很不错！”

停了一会儿，先生重拿画笔，在圆圈四周快速地点，不时又勾几笔短线，一幅白梅图就在圈圈点点中展示了它的风骨，平淡天真。

我连声说：“好！好！既不是吴昌硕的一枝独放，又不是关山月的革命红梅……”

吴凡也忙说：“冷峻！”

又是一阵无语，先生淡然一笑，轻轻把画提起，撕碎，揉掉，说：“乱！”

吴凡忙上前欲阻挡，说：“很好哇！很好哇！不乱！不乱！”

先生说：“心乱。”

我木然。

大家坐了一会儿，都不说话，陈子庄并不甘心，他又到床边找纸。好像突然想到，立即端上凳子，在床顶上找了一张正宗的安徽夹宣，裁成四尺六开大小，这可能是他最尊贵的纸了，他的画大多是画在包水果的土纸上的。这次他小心铺好纸，不言语，一口气画了一张立幅松鼠，背景是松枝松针，笔力遒劲，墨色丰富，无疑也是一张杰作。先生似乎也较满意，终于在画上题了上下款：以时同志指正，石壶写。

我虽然很高兴，但我更喜欢他撕掉的两幅，那是真正体现陈子庄“同能不如独擅”的作品，是前无古人，现世没有的。而后一张则仍有齐白石、吴昌硕的痕迹，撕去两张震动我心灵的极品，我至今感到非常遗憾。但我毕竟得到了先生一张画，还是很高兴。当时不知道怎样感谢，吴凡说你给陈老师画张像吧！于是我用他裁下的同样大小的安徽夹宣给他画了一张肖像，大约半个小时，可以说非常像，毛笔画的，也还算是有笔有墨。后来李华生告诉我，他说老先生对你那张画是不恭维的。我相信李华生说的话，我知道我那幅画是一张蒋兆和式的“素描国画”，这与陈子庄的艺术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至今回想起来仍觉汗颜。

陈子庄说过：不在笔墨，而在意度。又说：透视、光影、解剖、比例这些洋玩意，是为描摹形骸用的，“国画中一定夹杂不得的”。“凡艺术仅依耳目视听者都不高”，他在题画诗中写道：“妙在性情能自见，莫将形质镂心肝。”

陈子庄当年这几张画和作画的状态，以及作画过程中几个短语，常常在我脑中浮现，就是我现在作油画时也常常出现当时的景象。我后来读了一点中国美学史料，逐步意识到先生说的“心乱”“不顺”“不得意”，三个短语对应的是心源、气韵、意趣。而这些正是中国意象艺术最核心的精神。

我在文革结束之后，从狱中出来，迷上了戏曲人物画和田园山水。在狱中，我与一个著名的川剧艺术家曾在一段时间中同牢，他连说带表演地给我讲了不少川剧故事，唤起了我童年时期看戏的很多回忆，并使我顿悟到了中国戏曲从文学、音乐到表演程式，都非常充分地体现出中国艺术非写实的意象美学精神。联想到陈子庄先生作画和谈话中传达的意味，我似乎已开始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心脏脉络。在当时监狱严酷的管制下，冒着违犯“监规”的巨大危险，我用铁门上锈坏的碎铁片作工具自制竹笔，溶化深棕色的中成药片作墨水，画了几百幅戏曲人物画，包括《做文章》《文武打》《跪门吃草》《别洞观景》等著名川剧喜剧，甚至还将大戏《白蛇传》《芙奴传》等编绘成完整的戏曲连环图画。这一切都是在唯

一能带进牢房的马列著作的眉页上和手纸上完成的。

【忆旧思亲】

艰难岁月中的温馨记忆 ——回忆我的中学老师毛礼钊

张一哲

按：本篇选自作者的自编自印文集《追忆与怀念》。

我的初中地理老师毛礼钊

记得有一位知名学者曾经说过，60年代的重点中学，有很多高水平的老师。他或者是有亲身经历，或者是内行了解情况。我完全赞成他的说法。

这种特殊情况，大体是由于当年实行阶级路线所致。一些有所谓“历史问题”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才，不能留在或者进入大学，而是放在中学里。作为亲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我要说，他们的不幸，又成为我们学生之幸。

比如，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数学老师是北京大学6年制本科毕业的高材生，而俄语老师则是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等等。

我这里要说的，则是我初中的地理老师毛礼钊。

一般人都不太重视甚至不太记得他们的中学地理老师，因为地理是一门非主课。师生之间接触很少。而毛老师是个例外。一方面，她气质高雅而又朴实，为人严谨而又温馨，另一方面，留学日本奈良师范学院背景，也使得她在当时小地方的中学显得出类拔萃。

1961年的9月到1962年的夏天，我在吉安一中读初二。初中的地理课，中国地理加世界地理，总共是一学年。在当时人才奇缺的中国，一位德才兼备的女留学生担任我们的地理课老师，无论如何，是难得的福分。

我想，我的地理知识，有大半是毛老师给打下基础的。

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之后，发下来的卷子，我是96分。但仔细一看，有两道问答题，原先是给的满分20分，后来才改成18分。这显然就是为了避免满分。毛老师后来对我说，如果是别人，这两道题当然就是满分，但对你要更严格一些。你可以理解吗？我忙点头答应。

从小我就对天文学感兴趣。就在初二那一年，我买了一本俄国人写的《太阳

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有一天课后毛老师和我聊天时，我问了几个问题。她大吃一惊，说有些东西她也不太了解。于是她就介绍我阅读了好些 1949 年前出版的天文学书籍和苏联出版的天文学书籍。在她的鼓励下，我每天下午都去图书馆看《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

毛老师兼我们的天文气象兴趣小组指导老师

那一年，我参加了学校天文气象兴趣小组并担任组长，与担任指导教师的毛老师有了更多课外接触的机会。

那时学校有一台小的天文望远镜，可惜不允许学生使用。毛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了那台望远镜，当场给我们讲解，但那时候我们只是乖乖地看着，一动也不许动。那年月，这是一台奢华的设备，成天只是被绒布包着，几乎没怎么发挥作用。这应该是校方的规定，毛老师也无可奈何。

毛老师给我们上天气预报的课。她亲自带我去看百叶箱，测量降雨量，观察各类云。

我记得她给我一本有关气象谚语的书，同时也挑了一些给我讲解。那本书配着插图，我有点喜欢。至今还记得“月亮长毛，田坎不牢”之类的谚语。

记得有一次，我观察到天上有种鳞状云，想起“鱼鳞天，不雨也风颠”的谚语，就打算预报明天有雨。我走到校门口黑板去写预报，正好遇到毛老师，她也赞成。这个预报后来应验了，我们很受鼓舞。这个气象预报小组并不每天预报，但预报的准确性却蛮高的。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毛老师去她房间，看见有一位男人坐在桌子旁边，毛老师没有介绍，我也没敢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丈夫周大受。

周是日本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他的令人羡慕和炫目的学历背景，当年却成为一个耻辱的标志。某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轻蔑地说，他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那年月，日本和帝国两个词不是一般的贬义，而足够煽起歧视和仇恨。人们似乎完全不用了解他是否真做过什么坏事。我的五外公也留学日本，1949 年前在中学教书，后来也成为“历史反革命”，家人全都与他划清界限。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专政的威力所致。我后来知道，周老师毕业的京都大学确实是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但京都大学其实有偏左的校园文化。京大教授河上肇是信马克思主义的，他的一些学生在侵华日军中做转化日军的工作很有成效。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台湾的李登辉当年在京大读《资本论》，回到台湾就加入了共产党。李登辉后来搞“台独”之后要去访问母校京都大学，左派学生硬是没让他进校门。即使排

除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毕业于京都大学也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啊（直到今天，京都大学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中也是远远高于北大、清华的）！周老师回国后立即投入抗日工作，在广西柳州步兵学校担任日文教官，中校军衔（今天写下“日文教官”、“中校军衔”这两个词汇终于不是贬义了）。周老师在课余与学生聊天时，曾预言中国今后可能是共产党的天下。这话不料被学生中的特务告密而致使周老师失去教职。周老师身上背着这个处分，1949年前一直不得意。却不料1949年后他又因为军校教师的这个经历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为政治贱民。在60年代的阶级斗争氛围中，毕业于世界名校的周老师却连在中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只能干工友的活。

高二小整风中毛老师的微笑

初二之后毛老师没有再担任我的科任老师，但在校园里也多次见到，她每次总是笑着和我打招呼。

1963年夏天，我以全地区统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吉安一中高中部，成为老师和学校的“宠儿”，然而，1964年秋天，我却因为领头挽留北大毕业的数学老师而被学校某政治教师发动的高二小整风所整治。个别文化很低品行极坏之人，借着所谓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对我的揭发和监视。一时间，从小就是全市全校闻名的三好学生，一直人见人夸的尖子，神童，天才，突然成了谁也不敢理睬、唯恐避之不及躲之不远的人。那时节，不仅同学，连老师们也表现出对我明显的疏远，我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礼钊老师。

那是高二小整风高潮中一个冬日下午。我正独自走在校园的中央大道上，迎面遇到了她。就在我抬头望她的时候，看到她脸上慈爱的笑容，那是母性的、充满善意的天使的微笑，这是近几个月来我唯一见到的来自老师的真挚笑容。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笑和我点头。但那个冬日里她的灿烂一笑，使我感到太阳般的温暖和温馨，使我几十年后还能回忆得出那感觉。

记得文革后我跟毛老师讲起来当年这一幕，她还依稀记得。她说，不容易啊，读书就像犯了罪，读得好就要整你。一点公道都没有，一点天道都没有。她说的是一个教师的最正常的心理，教师总是喜欢爱读书读得好的学生，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感情也常被扭曲。我现在还记得她说话的样子和语气音调：一个小孩子，仅仅因为读书读得好就遭这样的罪，造孽啊！我心里真难过啊！当时也是自顾不暇，也不敢对你说什么。也只是没人的时候才敢表示友好。那些人都是良心让狗吃了。我说，你这个笑容对我非常珍贵啊。

文革中毛老师挨整家破人亡

文革十年，对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一场严重考验。

文革初期，我记得是在1966年8月。一天夜里，我们班被分配看守校内的“牛鬼蛇神”，主要是刚揪出来的个别“黑帮”教师和少数已经划为“历史反革命”的教师。我在一中的厨房里见到了毛老师的丈夫周大受老师。他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正和几个人劳动之后到厨房吃饭。这位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海归，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只能做苦力。也许正因为长期做工人，他文革初期就是所谓“死老虎”，比打成新黑帮的毕业北大的数学老师处境还要好些。落到这步田地，我想象着他内心的悲哀。但那天我见到他时他居然是笑着的，令我感慨万千。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老师。

1967年下半年我们这一派群众组织在一中短暂掌权。那一段时间见过毛老师几次，每次她都是开心地笑着。到1968年上半年，情况就有点变了。那年春天，我们贴出了反对当时的“江西王”程世清的“五七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对江西刚开始进行的“三查”运动的看法。不消说，我们很快失败挨整，而一中教师中那几个素质低劣的极左分子一下子跳得老高，成了“三查”运动的骨干。那年夏天在一中办了一个“三查”运动展览，有天我被安排去参观，见到了后来的凶嫌之一某人得意的脸色，心里被一层阴影笼罩着。这年8月，我父亲在“三查”运动中被“揪”出来，我毕业分配工作到某工厂也因之被拒收而失业。我们狼狈地离开一中，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毛老师。后来听说“三查”中那些打手们罚她跪竹签，以致两膝留下累累伤痕。

几年后，当时唯一留校的一位同学告诉我，毛老师的丈夫周老师在“三查”运动中被一中几个教师活活打死了！事情发生在我们离开学校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他提到了这几名打手的名字，都是我所认识的，几个政治教师和一名体育教师。当时算是家庭出身好的，或是党员，但在我看来是一中品行最坏的几个人。他说那天毛老师自己来找他，执意要他陪同去医院处理后事，其实也包含着要他见证真相的意思。因为，那些打手们说周老师是畏罪自杀。他告诉我，那天毛老师很镇静也很坚强。我想起毛老师那慈母般的形象，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下，一直有一颗坚强的心。

文革后，毛老师要求落实政策，又来找过我这同学。她说，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们打的，我也知道是哪几个人打的。我就是要求查清真相。但是，那几个涉嫌打人的凶手，一个也没有受到追究和惩罚。这是因为他们文革中站在后来“胜者”一边，因而无形中受到保护。他们在中国政治中站队站“对”了，但普通人都很

清楚，他们在中国和整个人类良心的站队中完全站错了。几个中学教师中的败类，将一条鲜活的生命扼杀，什么动机呢？他们表演的可能是革命热情或阶级仇恨？但苍天在上，至少对于这几个人来说，这完全是假的。知情人说，其中有人平时强向周老师“借”钱，却不肯还钱。据说，有次周老师喝多了酒，说谁谁借了自己钱，不想还了。此话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怀恨在心，丑恶的灵魂居然起了杀心。我相信，此时的阶级斗争对于他们仅仅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后来我了解到，周老师被打死的当天，学校三查领导小组就贴出了“周大受畏罪自杀”的大标语，这一方面是当年三查运动中枉法杀人后的惯用手法，也是凶手们（三查小组就是他们所主导的）推卸罪责的伎俩。毛礼钊老师坚持，你们说是自杀，那就拿出医院证明来。那伙凶手挟“三查”运动的高压，企图逼迫地区医院病理室的胡主任出具周大受自杀的伪证。碰巧的是，胡主任是周老师的学生，他面对老师的遗体，把悲痛留在心底，亲自仔细地做了遗体解剖。最后，他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做出了“肋骨被打断插入肺部，引起败血症死亡”的结论。今天人们谈起文革中的罪错，往往不自觉地将责任统统推给林彪、“四人帮”或者毛泽东。他们当然负有责任，但所有具体的罪错，都应该有具体的承担人。而且，即使在大风大浪中一时使人晕头转向，即使一时有某种统治意识形态惑迷人的心智，但人心中的良知和邪恶还是潜在地支配着人的行为。致人死地又企图掩盖真相的凶手们，和面对高压坚持良知的胡大夫，就在这场历史的大考中，用自己的言行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这几名凶嫌文革后虽然没有受到过应有的追究和惩罚，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后来得知，这几个人一一遭到“天谴”。应了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比如，凶嫌中的一位政治教师，后来回到老家万安县教书，几年后得癌症死去。另外一位体育老师，因为在文革武斗和“三查”运动中跳得老高，居然也改行当政治老师，过几年也得癌症死去。据说，他那天用脚踢周老师，致使周肝脏内出血。传说后来这凶嫌踢人的那只脚剧痛难忍，把床板都踢烂了。

凶嫌中有一位党员教师，是文革中吉安一中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现在许多人听说写第一张大字报就以为他是造反派，却不知道1966年6月运动转入校内时，第一张大字报矛头都是对着著名知识分子，写大字报的人都是被单位领导布置的打手型先锋，几乎清一色后来都成了反对造反派的骨干。此人当年业务很差，为人猥琐，一贯极左，甚至长相也像电影中的反面人物。仅仅因为头上蒙着一层“党员”的虎皮才那么神气。当年在我心目中党员是一个无比崇高的称号，唯独对此人，我从来没有过好印象。这个在文革中整人无数的人最后也没有好下场，虽然挨整的人无力向他讨回公道，但上帝亲自出面让他早早离世。

凶嫌中还有一名文革前一中党支部委员，因为教过我们政治课，担任过我们班联主任（当时的一种职务，同年级几个班的召集人），并且和我有过多多次交道，我比较熟悉。这也是几名凶嫌中唯一和我有过交往的人。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他担任过一点小小的领导职务，当然也从来没有因为参与致周老师死的围殴而受到任何追究。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他也得了癌症。我后来听一中的一名老高三学生告诉我，他死前曾经到东固山找过去的学生谈话，有一些忏悔的表示。不过，丝毫没有提到打死周老师这件事。据说他也向周老师“借”过钱而不还钱，我想他不至于因此而要周老师命吧？

所有凶嫌没有一人逃脱了“天谴”，这使人不得不相信真有报应。然而报应来得如此之快，也有些令人意外。难道是周老师的冤魂让阎王爷也无法忍耐？

对于已经 60 多岁的退休老人，作为读书人的他们要基于怎样的残忍心理，才能将他活活打死呢。

我不知道这几个人的灵魂后来是否不得安宁，从他们多数都患癌症来看，内心一定是没少受煎熬的。有煎熬，就说明心中还存有人性。但愿上帝能够挽救并宽恕他们的灵魂。

曾经有人说周大受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的。我想，这不过是受官式文革叙事污染和歪曲的说法。无论是这几名凶嫌，还是后面支持和保护他们的人，都与文革造反派没有丝毫关系。相反，他们几个人在吉安一中都是仇恨造反派和镇压造反派的知名打手。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些凶嫌是造反派，文革后早就坐牢甚至枪毙了，怎么可能如此逍遥法外，还要麻烦上帝亲自出面来主持公道呢。

文革后再次做毛老师的学生

1979 年春天，我听说地区科委办了一个日语进修班，是毛老师在主讲。3 月 8 日晚上，我赶到地区科委三楼的日语教室外面，见到教室里面毛老师正在给满教室的干部学生上课，而有两人在窗户外旁听。我了解到，窗外俩人也是干部，但没有来得及报名，或者单位不给机会。我那时只是个工人，于是也在窗户外站着听课。心里高兴的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留学日本的毛老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了解到这个夜大学班已经开办几周，是用湖南大学的一套正规日语教材，用三个学期的学习，完成普通本科学生第一外语的全部教学任务，于是决定坚持去旁听，并且自己去书店购买了教材。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毛老师注意到我，课间休息时出来和我打招呼。此时已经有若干人在窗户外旁听。逐渐地，教室内有了一些空位子，有些人跟不上，有

些人没有兴趣，退出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人有机会但他们毫不在乎；有人没有机会，但他们想尽办法找机会，一有机会就不放过。

就在第一学期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有一天晚上课间时，毛老师说，窗户外旁听的同学全部可以进来听课。这是毛老师向地区科委分管此事的干部建议的。那同志也很开明，在他看来，学习总是好事情。没有任何政审，也不要介绍信（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歧视、分等和侵犯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权的办法），我们旁听生全都进了教室上课。

快到学期末的时候，毛老师又宣布，地区科委同意，我们旁听的学生都可以参加期末考试。

随后，科委把我们的考卷，同正规途径来进修的干部一样，寄给各单位，希望单位领导能够支持。因为上课时间都是晚上，业余学习并不影响工作，我所在的工厂领导这次也开明地同意我参加这个班学习，于是我就成了正式学生。

三个学期之后，这个班结业了。结业考试，我考了第二名，97分，获得科委颁发的结业证书。1980年夏天，科委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毛老师和我们合影留念。

1980年，我就是凭着在科委日语班这一年半的夜校，参加了当年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外语考试，并且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我考研之后因为吉安有人告黑状而落第，我去找科委的同志帮助申诉时碰到毛老师，她大声说，真是苦命啊。又说，一定要告到中央去。她对科委的同志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没遇到第二个这么有天分的学生。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一定是清华北大的料。后来，我了解到毛老师的孙子 and 外孙都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她的晚年应该是幸福的。

以后，我成功地把申诉递到了胡耀邦手中。第二年春天，《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我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消息。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毛老师，她笑着说，我看到了报纸，大快人心。

听人介绍，毛老师是民盟成员，她曾担任吉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连任多届，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卸任。后来，听说毛老师还到北京等地参加了《日汉大辞典》的编辑等工作。她在81岁高龄时在吉安病逝。

我常常想，像毛老师和周老师这样留学日本的青年人才，对于那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其实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啊。但是，某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及其派生的政策，以及少数寄生其上的人们，却极其愚蠢地排斥他们，剥夺他们为国效力的机会，随意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听说就在周老师被“三查”运动揪出的前一星期，还在无偿地为吉安线材厂引进的日本设备翻译日文说明书。那时候，在吉安这样的小地方，有京都大学毕业生，是多么大的福气啊。而翻译引进设备的日文说明书

的最佳人选，自然非周大受莫属。对于这样稀罕的为国效力的机会，周老师也极其珍惜。但吉安一中那几个没有文化又没有品性的“三查”干将，却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周老师的翻译工作而将其投入“牛棚”，并且在几个月后非法非人性地剥夺了他的生命权。毛老师幸好还等到了天亮的时候，而周老师则不幸抱憾终生。

几十年过去了，毛老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吉安一中的那些艰难岁月，因她母性的笑脸而留给我温馨的回忆。

【忆旧思亲】

怀念在牛田洋遇难的晏家富同学

萧建民

晏家富，四川大学外文系六三级学生，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人，1965年秋我进校时他已上大三了。晏家富瘦高个子，背有点驼，头顶有些秃，稀疏的头发有的已略呈灰白，一副老式近视眼镜总是戴不到位，在鼻梁上半挂着。他走路迈着方步，不紧不慢的，颇有些老成持重的样子，在同学中很是引人注目。

晏家富说，他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从小还要帮家里做事，所以将近10岁才上小学，中学读的重庆六中（现求精中学），考上川大时已近22岁了。晏家富总是穿一件洗得褪色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旧蓝布裤子又短又小，只长及小腿（俗称二马裤）。夏天老是套一件圆领老头衫，后背上很多洞，原本是白色的圆领衫已被汗水浸渍得发黄。他有一双布鞋，手工做的，平时舍不得穿，常常打光脚板，是川大有名的“赤脚大仙”。因为常年赤脚，一双脚板又大又厚。

晏家富还抽烟，是那种非常廉价的几分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手指头被烟熏得发黄。他吸烟的动作和表情很有特点；当他用手指把香烟送进嘴里后，总是猛力地吸上一口，然后眯缝着眼睛，再把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地喷出来，细细地品味着，做出一副享受状，有点夸张。我在一旁看着，颇觉好笑。

我们都住在七舍同一层楼，又是重庆老乡，有事就串串门，摆摆龙门阵（聊天）。晏家富常以老大哥的口吻向我介绍学校和系上的情况，说点轶闻趣事，还讲点为人处事的道理，显得很语重心长，还风趣幽默。因为他是高年级同学又显得格外老成，所以我们都喊他“老晏。”

1966年底，正值文革初期，党中央号召全国学生步行串联。我们原重庆十三中（兼善中学）考上川大的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支步行串联队，计划从成都走向重庆，大家戏称为“还乡团”。老晏从我口中得知消息，可能是为了节省回家的车费，也报名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12月9日清晨，队长、化学系的甘性

刚举着“四川大学一二九长征队”的红旗，大家背着背包，顶着浓雾，冒着寒风，踏上了征途。

第一天走到成都郊区龙泉驿就天黑了，在一所中学住宿。沿途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所谓接待站，就是在乡村学校简陋的教室地上铺上干谷草，用木棒一拦，就成了一个大通铺。晚上有用大铁锅烧的热水免费供应洗脸洗脚。大家走得十分疲倦，匆匆忙忙吃完饭洗了脚，就着昏暗的油灯亮光，打开行李卷，倒下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蒙蒙亮，打起背包又开始新的征程。

行至简阳县石桥镇时，已是傍晚，大家在路边小饭馆入座进餐。老晏打了一碗白酒，下酒菜是一个卤兔脑壳，3分钱。由于老晏使筷子的技术不好，兔脑壳又大，一不小心，兔脑壳从土碗里掉到地下，老晏连一口都没能啃上。小饭馆地面坑坑洼洼，油腻发黑，兔脑壳在地上滚不见了。老晏连忙把眼镜扶正，低头弯腰，钻到桌子下寻找，终究未能找到。老晏直起身来，连连摇头，不停地叹气：“唉呀，可惜了！可惜了！”

队伍经过乐至县，那是陈毅元帅的家乡，桔子4分钱1斤，广柑7分钱1斤。在安岳县，我们几个去肉铺割了两斤猪肉，好像才3角钱1斤，提到饭馆加工，加工费1角钱。厨师给我们做了炒肉丝、回锅肉好几样菜，还有汤，大家吃得很满意，老晏也特别高兴，又喝了半碗白酒。

翻过崇山峻岭，经受日晒雨淋，我们的双脚打满了血泡，胶鞋和线袜都磨烂了。大家互相鼓励，没有人埋怨叫苦，还一路上搞宣传，助贫困，参加生产劳动，锻炼革命的赤胆红心和坚强意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历时20天，我们终于靠自己的双脚从成都走到了重庆，回家过新年了。

在重庆，我们几个同学在老晏的带领下参观了他的家。在从上清寺到曾家岩之间嘉陵江边的土坡上，一个用石块垒成的棚子就是老晏和他父母的“家”。棚顶用木板、油毛毡和塑料布搭成，用石头压着以防被风刮走，真正是“上无片瓦”。门框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草席。室内空间低矮狭小，家具用品极其简陋。老晏的父亲是在重庆街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水果的小贩，间或也收点破烂，老实木讷，不善言辞。其母多病，当时正卧床休息，身上盖着一床发黑的旧棉絮。所谓床，是一块搁在砖头上的凉板。

如此穷困的城市贫民家庭，我是第一次亲眼目睹，颇觉震惊。然而，也许是多年生活习惯了，老晏似乎还很坦然。我想，“晏家富”这个名字，一定寄托了他父母殷切的期望和美好的理想。

1968年年底，四川大学外文系六八届毕业生集体奔赴广东汕头牛田洋的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老晏也去了。那个农场属广州军区某部队，大片田地由围海造堤而成，是外交部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下放劳动的基地。在那里劳

动的，除了国家外交部的干部职工外，还有全国好几所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两千多名（其中有后来当上了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他们在农场顶烈日、冒风雨，耕田插秧、除稗施肥、播种收割，过着军事化管理的生活，等待再分配。

1969年7月28日，牛田洋遭到百年未遇的强台风和大海潮的正面袭击，房屋被冲垮，营房倒塌，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汽车、拖拉机被抛进海里……灾情严重，形势危急，可是，部队首长却提出“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革命口号，迟迟不下令撤离。战士们和大学生们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的画像庄严宣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牛田洋”！拦海大堤被冲溃后，军垦农场的解放军战士和大学生们在风暴和巨浪中携手并肩，英勇搏斗，直至最后苦苦挣扎，被无情的洪水吞噬，伤亡十分惨重，部队战士英勇牺牲470名，各校大学生共有83名壮烈牺牲。四川大学外文系六八届有7位同学不幸遇难，其中就有晏家富同学，他牺牲时年仅27岁。

消息传来后，远在成都的川大外文系师生为遇难的校友举行了追悼会。会上，随着低沉的哀乐声，我眼前不禁浮现出老晏同学生前的音容笑貌，心情很沉痛，哭得很伤心。

【编读往来】

李正权对上期蒋国辉文提出一个问题

上期所载蒋国辉《“武装支沪”中一次血腥而荒唐的战斗》，写得十分真实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读后颇有启发。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当年参加过武斗的人，读到许多地方都会产生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慨。但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从文章里看不出那次参加的“武装支沪”是什么时间，因为当年在四川进行的“武装支沪”从大的规模上讲有三次，先后发生在1967～1968年间。不知作者参加的到底是哪一次？

《昨天》编者答复：

这是编辑时的疏忽，原稿是有时间的，该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文中说到“那是我们到永川经历了第一次荷枪实弹的‘战斗’之后不久，又投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而在永川的“第一次荷枪实弹的‘战斗’”那一部分，已经以《在“为毛主席而战”的日子里》为题节选载于《昨天》第35期（重庆武斗专辑）中，作者亲历的这些武斗都发生在1967年8、9月间，直到当年“九五命令”后交枪，以后作者就没有再参加武斗。

顾嘉滨对上期徐友渔文提出一个订正

38 期中几篇关于武斗的回忆文章都写得很精彩。给我，相信也会给其他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亲历者的记叙为今后研究文革的人积存了可贵的史料。只是徐友渔文中有一小疵，他提到的川棉一厂，其全称是四川省第一棉纺织印染厂，不是文中所写的“棉织品一厂”。在纺织系统，棉织品厂一般被理解为针织厂，那与纺织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厂。